



言思录

第三期

2014年3月5日

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部、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博士沙龙工作坊 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

上外博士沙龙
电子期刊《言思录》
(第四期) 征稿启事

1 版

中国软实力建设方案

2 版

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
理性批判与文论的
理性精神

6 版

H.D.F 基托《希腊人》
主题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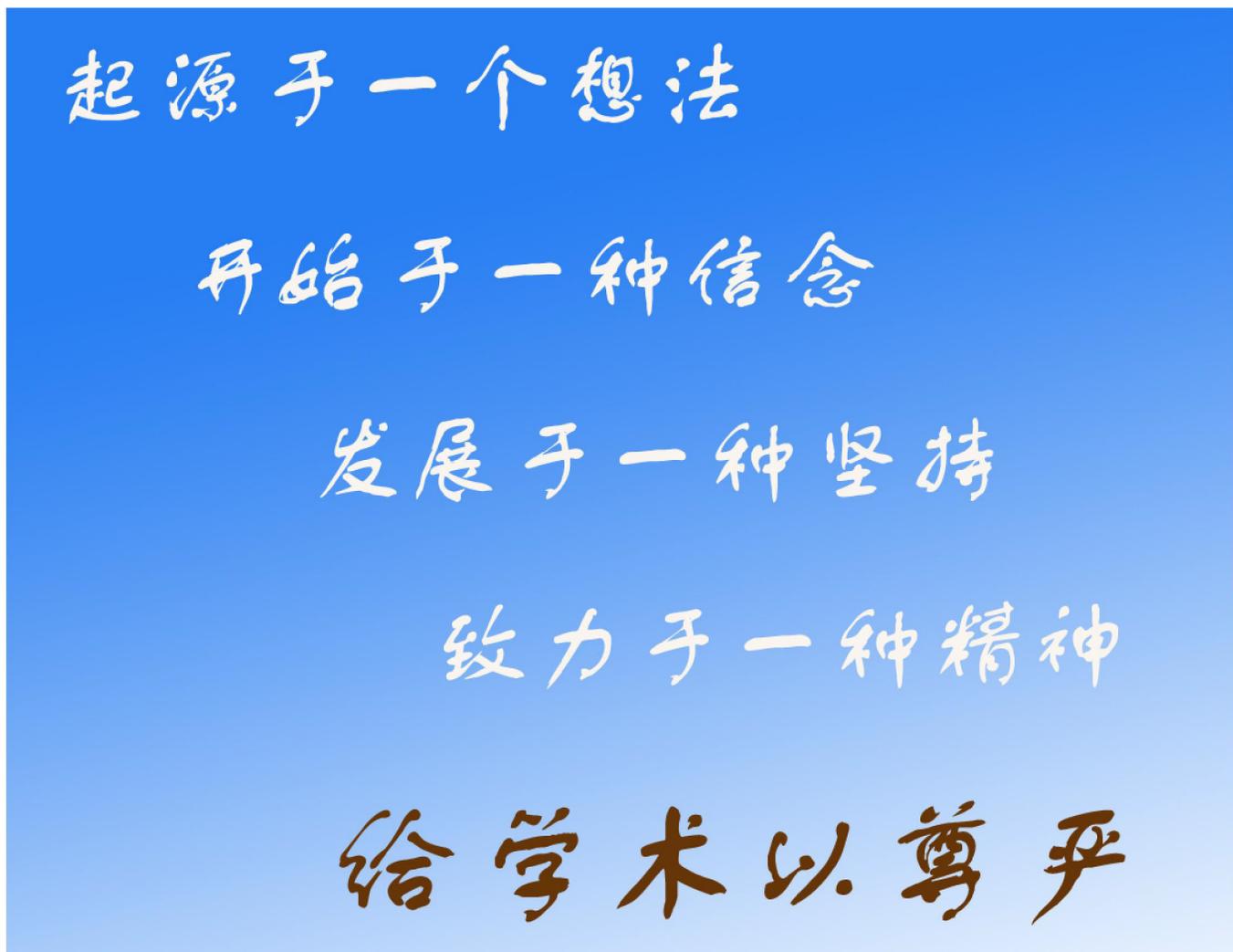
10 版

访谈实录——访早
稻田大学森山卓郎教
授，上外齐铎老师、
顾悦老师

12 版

顾问：汪小玲、韩殿秀
本期特约顾问：熊文驰
指导：杨雪莲、夏卡莉、
丁娟、张艳、盛攀峰、
董照磊
策划：徐谥律、朱硕
主编：陈晓
采编：蔡玲丽、陈静、
褚鑫鑫、刘畅、刘欢、
徐宜修、周阳雨
特邀编辑：周萌
版面设计：陈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邮编：200083



嘉
宾
寄
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与思想结伴而行！

理论给你眼光，让你与众不同。

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恒久的毅力、努力地探索，做出好博士论文。

知在行中，理在事中，在行与事中勤行濯思，就可以更理性地生活，也因此更多一些自由。

——门洪华 (2013年10月28日第112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武心波 (2013年10月28日第112期博士沙龙特邀主持)

——陈新 (2013年11月28日第118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郑新民 (2013年11月5日第114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高楠 (2013年11月8日第115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上外博士沙龙电子期刊《言思录》(第四期) 征稿启事

各位研究生同学：

大家好！

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拓宽学术视野，推动学术思考与创新，上外博士沙龙电子刊物《言思录》(第四期)“主题书评”版块现面向广大研究生同学征稿。本期主题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由我校新闻学院副教授赵骏推荐。征稿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

1. 征稿对象：全国各高校硕博研究生

2. 具体要求：

1) 征稿书目：

《批评官员的尺度》 安东尼·刘易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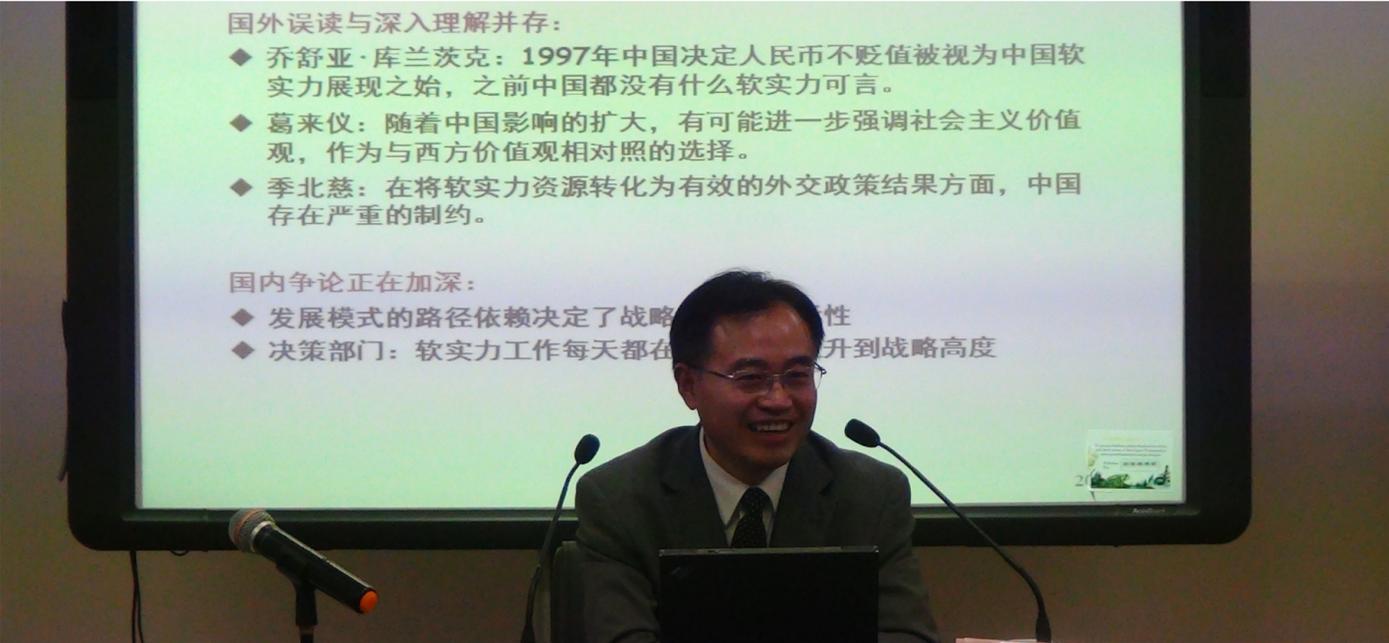
2) 请有意投稿的同学以征稿书目为读本撰写书评，或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感想，针对此书的某些内容和章节，撰写文章。注：征稿不限专业，诚邀各专业的同学撰稿。

3) 投稿截至时间：2014年7月20日。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文章长度：不少于1500字。

4) 被录用者的稿件将于《言思录》(第四期)刊登，并有专家点评。同时，作为感谢，上外博士沙龙将提供纪念品一份。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博士沙龙工作坊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部
《言思录》编辑部



国外误读与深入理解并存：

- ◆ 乔舒亚·库兰茨克：1997年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展现之始，之前中国都没有什么软实力可言。
- ◆ 葛来仪：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有可能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照的选择。
- ◆ 季北慈：在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结果方面，中国存在严重的制约。

国内争论正在加深：

- ◆ 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战略选择的非竞争性
- ◆ 决策部门：软实力工作每天都在进行，提升到战略高度

对汉武帝的描写，从中我们都看到中国愿意自我否认。历史后面的王朝总是去否认前一个王朝，这个历史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传统。刚才提到的中、西、体、用的排列组合也代表了我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

此外，我们文化弘扬做得不够，文化产业水平过低，与经济发展相比水平落后。其次，外在风险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文化的负面正在颠覆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化传播处于弱势也非常明显，在文化产品贸易中，即使用经济的数据去描述，进出口的比例是高度不平等的，但这种现状还是在新闻文化总署要求文化“走出去”、要求文化对策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想象我们在文化传播上的弱势。虽然中央电视台已在国外开设了电视台，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使华人也不怎么看。包括孔子学院，可以说部分华人、华裔、中国学者在骗取政府资金，实际上无所作为，我们的目标并没有达成。虽然这是极端情况，也有许多人在积极努力，但这方面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整体战略的设计仍然非常粗线条。

从未来的走向来讲，我们希望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2009年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强调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强化文化的战略地位。文化发展从来没有进入过文化强国策中，强化文化的战略地位是必要的。第二，重视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的文化和外来文化、他国文化有很大不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政府主导是必然的；同时从发展方向上讲，它需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三，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做到这一点必须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不能只想到为市场出让红利，应该考虑到首先要完成国家宏大目标。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的教训不该重演。其次要推动文化产业水平。第三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文化走出去。我们在国内打碎了孔家店，而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值得引进。现在的孔子学院主要作为汉语教学的机构，能不能将孔子学院改为复兴汉学的平台，这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个因素是观念，观念变革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一直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就这一条就证明了其重要性。如果将中国的观念变革进行线索梳理，可以看到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我们的决策模式。中国观念之所以发生变革，是我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比如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与革命”一直到现在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变化使得我们相信积极采取外国的观念是可行的。另外还有执政理念的变化，中共中央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1世纪，我们强调“和谐哲学”，包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世界上和谐梦的实现，都代表了观念变化。这种变化的另一主线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出现这些观念上的激荡。

观念变革中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体现：第

一个是经济主义。1978年以来，中国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出现了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思潮，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放弃。虽然有学者提出中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中国改变经济建设重心的布局有一定困难。经济主义既包括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安排，也包括国外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设计。所以在国内我们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我相信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进一步优化。在国际上，我们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第二个是制度主义。制度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国内制度建设，我国的立法进程是世界上最快的，当然引发了不少问题，如《法官法》等，但是我们的决心是有，第二个方面是国际制度方面，包括参与、利用国际制度来维护、发展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现在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是积极的，在国内制度建设这方面和国际制度的不匹配仍然是存在的，怎么能够确保在制度方面中国有主动性，有一种顶层设计，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制度设计，是应急性的、临时性的，我们缺乏长远的考虑。这和我国历史上的变革，和西方国家的变革，都有关系。我们历史上的变革向来是先进进行制度变革。汉武帝攻打匈奴首先是国内进行一些明确的制度设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变革，建立好一系列的部署，最后才开展对外战争。这次的制度部署，正如我们领导人所讲，是一种实验性的、试探性的、临时性的、被迫的、被动的因素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个，我认为的是地区主义。对中国来讲，过去一般处理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其他一些事物往往都是双边地区。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才开始了对地区的消极、被动的态度，开始促进地区一体化，创立地区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变迁的便车提供一些制度基础。这些年中国对地区发展事务越来越重视。那么说中国现在的定位是一个世界大国吗？我个人理解，中国不是一个世界大国。我们虽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整体的影响力仍局限在我们周边，而且周边很多事务我们说了不算，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牵制了我们巨大的精力。因此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中心仍然应该在亚洲。这时的中国如果从过去的东亚大国成长为一个亚洲大国，但现在还不是一个太平洋大国，中国要成长为一个亚太大国，我个人认为还需要10-15年时间。在这个时候地区主义对中国来说仍然非常重要。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和谈。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在提中国梦，但和谐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理念，回溯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和外交思想，中国是不能不放弃的。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和谐世界，仍然被看做是党的一个核心执政目标，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目标。当然这也仍然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回归是有一定关联的，也就是要回到中国，回到中国时代。让中国时代打上中国更多印记，是我们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和谐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是一种战略“紧身衣”，一种战略约束，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约束了我们的作为的。

那么回溯这些变革的目标，我们说这些

变革是“务实”的。从邓小平时代，“务实”这个词就和国外外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但是缺少了理想性因素。我想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没有理想是非常可怕的，就像一个人没有信仰一样。好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挖掘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理想的国家，我们有国家理想“大一统”，我们有社会理想“大同”，我们有世界理想“天下”，这些理想也许超出了我们实践的、掌控的范围，但它无疑代表了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美好想象。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重新挖掘理想，重塑理想。对中国未来而言，加强理想性，更加开放、更加中国化，将是我们观念变革的趋势。

第三个方面是发展模式。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适合一个国家的潮流。适合一个国家的根本国情的发展战略，关于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成败。大国普遍重视发展模式，中国也非常重视发展模式。检视我们60多年来的发展模式，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不断演进，一直处于变革；第二，追赶模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放弃追赶的目标。追赶就意味着匆忙，就意味着着急，就意味着不完善。毛泽东时代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探索，提出要“超英赶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说道：“经过五、六年，中国将迎来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毛泽东当年的目标都实现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对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是有信心的，我们正在为世界做出一些贡献，我们也期望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西方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机会。这意味着西方愿意让一些空间留给我们来运作，让我们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探索，这种模式的政策是“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贸易方面实施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那个时代（的模式）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关，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关。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时代，国际经历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农业生产体系。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体系，后来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开展，这也是由于这样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在企业发展方向央企保持了领导力，农村的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得以保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央企，如果没有农村土地和集体所有制，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答案肯定是不能。邓小平对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积极的转轨进行了探索，这样的探索中国引进了市场机制，实行了梯度开发开放的战略，这样的战略是以“物”为中心。就是要发展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就是要把外国在经济上不能看不起中国，要确保中国的经济成为中国整体发展的基础，所以当时经济的高增长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西方批评那時候的中国是“GDP主义”。我们确实实实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这个时代发展的匆忙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在一个虚空的条件下去讨论历史问题，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推行模式改革，我们可以试想一下，89年山

河变色也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现在可以看到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人”为中心，全面的发展改革正在进行，这种新的战略设计并不会摆脱“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检视我们过去60多年的发展状况，从传统的发展战略，到转型的发展战略，再到科学的发展战略，这三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累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真正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找到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路径，应该说，里面包含着一些消极的成分，包含了一些被迫、追赶的成分，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也有很多经验上的东西值得我们总结。西方有一种总结就值得我们去看，就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是它不仅考虑联盟国发展因素，还关注社会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要捍卫一个国家的自主权。“北京共识”提出后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雷默说，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北京共识”。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凝固的计划经济，我们没有像拉美的依附国那样脱离世界经济秩序去自行发展，到最后走向僵局。我们也没有像“华盛顿共识”要求的那样全盘西化，也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那样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的道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承认我国经济地位的国家不多，但根据我们当时加入WTO的文本，自2005年11月中国加入WTO第十四年起我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不需要他的承认。尽管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活力的。在面对着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检视了它的价值。当然它不是完善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发展模式，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发展中国家视为一种榜样，尤其是印度。印度的总理辛格在温家宝总理任职的时候曾访问中国，向总理索要了我们的十二五计划。他就是要看中国到底是怎么想的，要怎么进行改革。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为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的典范国家。尽管中印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冲突，但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印度对中国还是很敬佩的。另外一些后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实行授权体制的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关注的。我们一直强调是秉承一种孔夫子的思想，你要来学习就来学习，“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近几年在国防大学外国的一些经济官员正在接受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培训，在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中美开始了一系列的战略协商，最终在70年代初达成了战略同盟关系，在这个背景下，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中国在国际国内我们无所作为。86年在联合国提出

唯一的选择，中国的经验则提供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一种更强有力的选择。但西方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是冷战以来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真正变成了一个世界所追随的模式，那中国就是世界霸权主义国家。

我们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积极的方面，它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无疑在成功之外，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比如说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政治腐败……这些都是西方攻击我们的因素，也是老百姓气愤的地方，在将来我们肯定要转变这样的发展模式。十六大我们从过去一直只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强调经济、社会“两个轮子”并行，十七大、十八大我们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正在推动文化这个“轮子”，但是另一个“轮子”要加强了——就是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必然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一些部署，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第四个方面就是国际制度，其重要性在于，这对一个崛起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新增长点，也是改变国际社会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途径有一个，就是融入国际社会。怎么融入？就是参与国际事务。从历史上讲，中国和国际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19世纪之前，国际事务对我们影响不大，当时中国是“决决上邦”，是东亚的主导。19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的

世界”向“世界的中国”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世界，就是天下，西方的坚船利炮打掉了我们的梦想，你不是世界，我们要你变成世界的一部分；第二个是我们从国际体系的局外向局内者转变。这个转变经过了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倚重以及中国在G20等国际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这两个转变已经完成。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值得一再回顾的历史，是我们检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个重要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参战国，而且成为了战胜国，但成为战胜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了权力。所以在安排战后事务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不仅无权参与，山东权益还从德国转移到日本，这就引发了五四运动——现代中国革命的开始。那时候的世界并不关注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可供蚕食的国家”，恐怕就是当时对中国的定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向当时的国际联盟请求调停，国际联盟遣英美国勋爵李顿里顿到中国调查，调查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引发了这次事变，要求当时的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进行制约。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想要倚重国际社会是没有用的。我们真正想国际会所关注、所尊重（的契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的血奋战。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坚守赢来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地位，就是成为联合国创建大国之一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当时中国的力量，大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丘吉尔都不愿意和蒋介石同台出席。但无论如何，中国就成了大国，就成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个时候的中国真正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中国的历史真是波折不断，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发生了爆发。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倒”，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我们处于冷战的前沿，成为了国际制度的挑战者。那时中国的选择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历史不能重选，但是我们有主动那时的中国面临的格局，总是会为此叹息，一个可能转变的时代，由于我们两党不能解决矛盾，使我们丧失一个崛起的重要时机。

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寻求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和其他国际组织地位，没有得到任何的积极效应。我们和西方的某些善于妥协的国家，如英国、荷兰，建立了对外级关系，加上国内在发展中出现的“左转”——在60-70年代，中国提出“两条线作战”、“四面出击”，不仅攻击美帝国主义，对“苏修”也毫不手软。那时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挑战是很明显的。1965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这时的印尼是非常孤立的。当时其总统及外交部长到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晚上举行了盛大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宣布说：“联合国是政治交易的肮脏舞台，我们要打碎联合国，重建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在一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世世总是要变化，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中美开始了一系列的战略协商，最终在70年代初达成了战略同盟关系，在这个背景下，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中国在国际国内我们无所作为。86年在联合国提出

两个议案，这就是《常规裁军议案》和《核裁军议案》。之前长达15年内，我们没有提出过一项议案。当时的中国，开玩笑地说，就像是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醒来不管别人说了什么，只说两个字“反对”。所以南非大使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有三句总的总结：“他们来了，他们笑了，他们走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是非常被动的，我们尽管已经参与其中，但仍然是局外者的心态。

改变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中国开始积极地、迫切地寻求国际社会经济援助。当时只要是能获得经济援助，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我们都要积极参与。中国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是由黄岐山挣来的。当时为了赢得世行的贷款，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中国农业信托总公司，是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外援对口对接机构，当时黄岐山担任该公司总经理。我们坚决执行与国际组织共同签订的条约，只要他们签订了，我们保证履约。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很多积极的政治遗产。这个时期到91年，中国的工作主要是寻求经济利益，在其他方面主要是发表一些原则性的声明，主动性并不强。主动性增强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中国被孤立，怎么办？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既然要融入，就要全面参与，这时候中国的参与是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征的。比如说，当时的《京都议定书》并未要求中国完全恪守其条约，但是当时朱镕基总理表示，我们愿意接受它对我们的制约。对比近期一些环境会议上中国的表现，我们在意识上有一定退步。

几十年的发展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对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在提高。我们让国际组织打上了中国的印迹，但是我们是后来者，我们在把物质财富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方面还在值得调整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联合国会的会费。联合国会费的计算有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GDP规模，另一个指标是人均GDP水平，其中GDP规模是主指标。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不到1%，但是毛泽东说：“这是我们重要的政治舞台，必须体现出我们对它的支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我们自己的GDP比重不到世界1%，但是我们联合国会费支出达到总会费的5.5%。从80年代开始，我们强调我们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个落后小国，我们开始大幅度降低我们联合国会费，直至1%以下。去年我们GDP总量占世界10.5%，所支付联合国会费比重为3.267%。我们的GDP是俄罗斯的2倍，但俄罗斯支付的联合国会费是我们的4倍。墨西哥、西班牙现在在上被我们所轻视，但是他们支付的会费也比我们多。在这方面，如何将我们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还有更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现在限制了官员吃喝，我相信，如果早年实行这一政策，我们联合国会费将会大幅增加。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向财政部相关部门，尤其是国际司提出建议，增加支付我们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会费，加大援助力度，彰显中国的责任。国际司每年都积极邀请我们书写报告，但是每年都没能真正实行。我们希望，财政部、商务部以后在这方面会有更加积极的考虑，真正把我们的钱用在实处上。

第五个方面就是国际形象。国际形象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曾经忽视了这一点。当然一个国家要维护国际形象需要多种方式，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也就把中国人的落后和保守展现在大家面前。中国人在海外大声说话，随地吐痰，看似个人行为，但大家认为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在冷战期间，我们中国人的形象没有加分。比如1966年我们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康生和江青的大使馆宣扬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一时间红宝书满天飞，全世界看到的都是毛泽东像章和红宝书。当时中国与43个国家建交，在短短一年半之内，和26个国家断交。前面提到65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之后到中国寻求援助，67年两国就断交了。我们太不关注中国的形象了，改革开放初中国一味强调自身发展，那时国际上对中国的的评价是“尼斯湖怪兽”：神秘，力量巨大，不可琢磨。一个人不可琢磨的话恐怕很难和他打交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9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形象才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中国做了两个战略宣示：第一是人民币不贬值，第二是做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大国。从这时开始中国才着力塑造一个负责人、有建设性的国家。所以中国责任论不是西方先提出的，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个方面早就有所认识。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一味解决分歧毕竟不是大国崛起之道。很多时候扩大共同意义也是必要的，比如我们和日本在政治上两军对垒，谁都不可能做让步。但在经济上，如非洲的资源开发方面，现在

还在合作。第二，中国积极提供公共物品，改变过去被动受援的形象。现在对外援助数额在迅速增长。我们相关部门明确意识到，包括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说现在商务部一家独尊对外援助一定不可能，将来建立新的机构也是必然的，这说明国家的制度建设肯定发生变化。第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91年以来每年一次国防白皮书，声明中国的和平意愿。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这些努力使得中国国际形象开始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真正的积极变化始于2010年。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现在在发展方面无可琢磨的因素。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些应对的做法，美国的战略调整，日本、东南亚的一些做法，都表明他们力图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力图博得从长远看某些不属于他们的国家利益。在此状况下，我们的国际形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不好因素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源于外国的歪曲，更重要的是来自国内恶性因素。比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和腐败泛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因素，民众也越来越关注民生问题和政治腐败问题。

最后我们谈一谈该怎么办。我们是旁观者，并未参与角色之中，所以我们只能提“书生式”的一些看法：首先，要确定定位。中国的定位从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角度，从国内角度来讲，201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确立在东亚的主导优势。我们在经济贸易的主导优势很明显，尽管美国、日本提出一系列的想法，但日本毕竟大江东去，它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日本能实现“和平衰落”就不错了。中国和美国安全方面的事务如何处理，和东南亚的关系如何处理，能否把整个东南亚打造成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点，这是我们未来两三年重点任务。第二，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有相当的难度。在国际上，我们要成为在亚洲发挥重要地位的准世界大国。2050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我们真正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大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全面融入、改革自己、塑造世界。过去是要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将来则必然要加大塑造世界的成分。做到这一点有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我们还要强调硬实力的作用，但要改变硬实力的运用方式，加强实力投入。像科研一样，有了更多经费才可能调动更多积极性，让老师安心做学问，还可以让老老师和学生在做学术研究方面有更多积极合作，把学生培养成专家，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第二，弘扬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驱动力，把弘扬传统文化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这是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事关中国的长远未来。第三，优化完善发展模式。我们真正在制定应对发展模式总体发展的战略。第四，强化国际制度参与能力，争取发挥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全球性的国际制度上，我们要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很多时候我们原本制定的一些政策在悄悄发生变化，如不结盟政策，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某些作为已经超出了“不结盟”的范畴。这方面是否要强调国际规则，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要通过国际规则的机制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不当头，这点来说，中国想当头也不容易。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都在形成一些明显的冲突，怎么去协调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对我们有预期，发展中国家你有期望。能否在不当头的条件下充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这是将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方面。第五，加强国内形象建设。形象建设最核心是在国内，为人民群众所关注，国内形象建设好才能完善国际形象。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1989年，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面对苏联变化时候，一个老布什强有力的说和平来源于力量。对力量而言，力量确实很重要。但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硬实力，还有软实力文化，枪炮不能进入人心，文化可能做到春风化雨。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和平来源于力量，这种力量即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正如易经所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为理想的中国，才能成为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尊重的大国，那时我们的国家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话语权问题，现在是媒体的时代，话语权掌握在一些巨无霸手中，美国、西欧不仅在国际组织中掌握政治权力，在倡议理念提出方面有优势，但新媒体的出现和网络普及，使得大众传播的时代开始了。影响力来自何方，是令政府感到最困惑的问题。传统大国在另用话语权引导和影响世界的能力急剧下降。另外，经济的分量决定思想和文化的重量。随经济实力增长，随着对他国事务影响力的增加，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必然得到更加积极合理的回应。中国人在力图发挥话语权，部分努力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这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要更加完善自己，才能做得更好。文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讲，价值观是关键，尤其是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对我们的文化有重大影响，它最终体现在国家制度上。在很多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后来的参与者，比如民主理念，政治制度设计方面，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密切与中国国情密切联系，与我们的传统也密切相关。现在我们在国家制度来自我们的传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构想和中国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我们积累的经验，这意味着我们的政治制度是进程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和苏联以及其他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老挝、越南等也不同。我们基本政治制度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心的社会，第二是发展的社会，第三是强调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是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的特色在于吸纳传统经验，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发展目标，接受西方国家制度优势，力图打造出一个属于中国的道路。我们的政治制度看起来集权、威权，但实际上又十分开放；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将在在政法、司法方面进行大变革，意味着开放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又保留中国传统的积极设计正在体现，它不是完整的，可能永远不会完整，但这方面的努力鲜明可见。

对中国来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天然链接的。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能不放棄。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有所发展的，不是僵化的。我们应该把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方法论当做分析框架，更多的是和实践的总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理解和认识的。第三，马克思主义是政治问题，学术研究是学术问题，两者可以有所关联，但没必要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前提或基础。

提问环节：

听众一：语言是软实力的凭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了全世界70%的话语权，尤如媒体。媒体除了官方的传播媒体等我们还注意到好莱坞、格莱美等娱乐媒体，对学生的冲击力更强。正如“谁做的有理不如谁说的有理”，那么关于语言，和话语权这两个文化软实力的评定，请问教授如何看待？

听众二：您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他的来源至少含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式，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听众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应该是必然的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中国政治制度或软实力吸引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我2006年到2007年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近70岁，他的夫人71岁，两个人都在学习汉语，那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在70多岁还在学习汉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长。现在很多国家在积极地学习和推广汉语，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出现了一些国家性的行为。个人行为是愿意了解中国，愿意从事和中国有关的事业，我们中国政府资助的留学生不到百分之八，外国提供资助的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中百分之70多是自费来学习的，这种动力是很足的。前两天瑞典的驻华大使请我参会，也叫了芬兰的大使，芬兰大使提了一个建议，芬兰人在中国非常少，芬兰对中国抱有友好的心态，芬兰大使说，能否向政府反映，让更多芬兰人到中国学习。这些因素表明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动力非常强大。语言不应该是很难的掌握的东西，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多积极努力。很多国家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都设立了基金。留学生项目吸引学生前来学习，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

话语权问题，现在是媒体的时代，话语权掌握在一些巨无霸手中，美国、西欧不仅在国际组织中掌握政治权力，在倡议理念提出方面有优势，但新媒体的出现和网络普及，使得大众传播的时代开始了。影响力来自何方，是令政府感到最困惑的问题。传统大国在另用话语权引导和影响世界的能力急剧下降。另外，经济的分量决定思想和文化的重量。随经济实力增长，随着对他国事务影响力的增加，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必然得到更加积极合理的回应。中国人在力图发挥话语权，部分努力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这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要更加完善自己，才能做得更好。文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讲，价值观是关键，尤其是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对我们的文化有重大影响，它最终体现在国家制度上。在很多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后来的参与者，比如民主理念，政治制度设计方面，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密切与中国国情密切联系，与我们的传统也密切相关。现在我们在国家制度来自我们的传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构想和中国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我们积累的经验，这意味着我们的政治制度是进程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和苏联以及其他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老挝、越南等也不同。我们基本政治制度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心的社会，第二是发展的社会，第三是强调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是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的特色在于吸纳传统经验，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发展目标，接受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力图打造出一个属于中国的道路。我们的政治制度看起来集权、威权，但实际上又十分开放；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将在在政法、司法方面进行大变革，意味着开放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又保留中国传统的积极设计正在体现，它不是完整的，可能永远不会完整，但这方面的努力鲜明可见。

对中国来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天然链接的。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能不放棄。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有所发展的，不是僵化的。我们应该把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方法论当做分析框架，更多的是和实践的总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理解和认识的。第三，马克思主义是政治问题，学术研究是学术问题，两者可以有所关联，但没必要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前提或基础。

从中文角度讲，“soft power”应该是“软实力”。我们的政府用的是“软实力”这个词，传统进行学术研究用的是“国家实力”，软实力和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用“软实力”更合适。内涵外延上没有差异，而是应用分析上的差别。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下午有幸参加大家的这个学术沙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搞这个基础理论的，离开现实，像你们直接提供的外国的各种资料，还有古代直接研究中国古代的各种资料的这样的环境比较远，主要就是思考一些理论问题。所以能够和大家进行这样的交流，对我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今天来呢主要讲什么问题呢？就是讲一讲当下能够形成文学理论的文学理性的状况。我要先阐发一下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经常和我的博士生们谈的一个话题。像博士生这个层面上，要是选择课题的话，就一定要当下的问题意识。如果这个问题本身在当下没什么价值，或者不疼不痒，那么我费了很大的劲，收集了很多资料，进行了十几万字二十几字言的论述，结果出来的没什么现实意义。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又多了一份学术垃圾，那么怎么才能就问题去思考呢？特别是，我现在在研究西方的理论，常常有一种感觉，和很多年轻人探讨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常常的被西方严密的逻辑，他们精美的理性表述给吸引住了，吸引住之后就陷进去了，因为如果按照逻辑来说，西方人从古希腊那开始下来，承接的是严密的逻辑性，特别是经过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之后，思就是一切，就是人的生存价值，那么思本身，它和物的世界是不相通的，不需要论证，就需要你逻辑严谨，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一旦被锁进这个话……我，2002年到复旦开一个会，有几个博士就很悲观，他说，我发现呢，越读西方的东西，就越觉得，就是我们倾毕生之力也只能匍匐前行地研究他们的东西。这个感觉，就是我在前几年读西方理论的时候，也很强烈。后来感觉到，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跟着西方人说，我们永远说不过他们，我们接着他说，我们也未见得说得过他们。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把我们从中国研究西方学者的一流学者的拿到西方去参加学者研讨会，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话语权控制权？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不聪明，是因为西方学者、西方理论有他们自己的语境，他们都是理性型的。从进入到19世纪之后，那样的一种完全在思考中，沉溺其中，靠严密的逻辑去自我完善的那种理论思路，在19世纪之后就慢慢的进行，所以西方当下的理论有极致的语境性，可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语境和他完全不同，那么我们非语境的研究西方的语境理论会导致什么呢？他就变成了一个脱离语境的纯粹理论。当它是纯粹理论的时候，他的逻辑严密性，是我们很难超越的。所以怎么才能面对着他的一些西方的这些极可宝贵的资源，也包括我们中国古代极可宝贵的资源，把它转化为我们当下中国理论建构的营养？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一个怎么寻找当下中国的问题。把西方的古代那一些可贵的资源用来求解我们的问题，它一开始用来求解我们的问题，它就进入了我们的语境，那么我们就变成主体，它们就变成了客体。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我很多会议上讲的，我们要有问题意识。你们在座各位呢，研究各自的西方文化，西方文论的代表性人物，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他国人的角度提出，因为你没有在那个语境中，提不出真正的语境型的问题。带着中国理论建设的难题，带着中国实践的难题，去找西方的资源。问题是我们自己。那么做了这方面论述之后呢我就说为什么我现在很关注理性问题。这个理性要是用一个概念来说，什么叫做理性呢？它就是人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他所面对的特殊领域的有序性把握。这个把握在理解成有序性理解与把握。这就是理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不搞文艺理论，你可以搞经济，你可以搞西方著作的研究，但是不管你搞什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理性

根据，你就叫做学习，学习和研究的区别就在于你向人学的时候，没有你自己。他是一切，他是你老师嘛。研究的时候，你跟他对话。再超越一步，转用的时候就不是对话了，你是主体，他为你所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理性，你怎么能够研究它呢？人家是利用理性写的理论，我们没有理性我们去研究它，我们就只能学习它。如果我的理性不清楚，你的理性是清楚的，我通过研究学习转为可以说和你对话的东西，你还没转用。那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互相对话。要想转用，就必须有自己的理性根据。你对生活有理性的理解，你对于你所研究的这个问题领域有了一些了解，有了这个理解了，我们就可以去思考问题，去求解问题，去阐释问题。而当你把你的思考、理解转化为问题阐述时，理论就产生了。这就是理性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理性是理论的这棵树的土壤。理论的树在理性的土壤上茁壮地成长。

所以人家现在呢你想研究什么课题，我想要追问一下，你现在拥有的研究理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要说大家，就像我这个年龄的，比我更大的一些前辈们，当下都陷于混乱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当下时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前的合理，现在不合理。先前的合理的秩序，现在变成不合理的秩序。所以要重构秩序。而理性前面我说的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对于这个领域之中的有序性的把握。这个有序性被时代否定了，被社会自身否定了，不是对既有理性就是一种否定。当既有理性被否定的时候，而新的理性又没有形成，那么大家想，理性能不混乱吗？

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进入到新世纪这段时间，整个的代表着理性说话的理论界，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对于中国的娱乐、对于中国的文学，谁掌握着可以判断的标准？没有谁敢说“我掌握着”。所以从后现代的角度说，“去权威性”正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理性建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大家都在摸索。但是大家要知道，任何理性的建构，它都是原有理性基础上的升华。所以尽管前辈学者、你们的导师们也在摸索，但是和你们的摸索不一样。他们有原来理性的深厚根基，他们在里面进行引发之后，他们建构自己的新的生活秩序，就是新的理性，要比你们现有的多。但是轻易是轻易，混乱是混乱。现在是整个理性混乱的时代。你们瞧，我们文学理论吧，每年一个年会，到现在为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些年会讨论了23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认真讨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为什么呢？就这些问题要想深入研究，你研究的根据不就是理性吗？你没有超越的理性，你怎么研究呢？

1997年，中外文学学会的会长钱中文提出了一个新理性的建构，这么一个命题。并且我为此写了几万字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按理论说，一个协会的会长提出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这个协会是不是应该蜂拥而起，以他为核心，展开一遍又一遍的研究，逐步地加深呢？没有。就是开了一次会。再有哪些呢，就是钱中文先生从事理论研究多少周年纪念会，一些学者去，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出了个集子就完了。问题还是在于，怎么深入？你比如说，钱先生当初提出的理性，他说我们要建设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要有理性的指向呢？钱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取向于哪？他认为取向于西方的启蒙精神。西方的启蒙精神在西方都已经更改很多了，不断的 changing，被现实突破着。我们在这样根本不是西方理性的情况下，仍然把西方的启蒙精神拿过来，怎么指导性建设呢？就很难指导了。所以从他提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理性取向究竟在哪。这个问题今天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在各种现象性的研究之中，混乱就是难免的。咱们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对于娱乐问题，中国呢几次，广电局下禁娱令，电视呢要靠娱乐去吸收接受者，扩大它的接受市场，从而呢获得广告效益。那么这个娱乐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该在什么度上去把握、对这个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说不清。他们说不清楚，是他们国家语境的事，他们有自己的机制去调整。中国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娱乐不清楚，你的理性是清楚的我，我通过研究学习转为可以说和你对话的东西，你还没转用。那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互相对话。要想转用，就必须有自己的理性根据。你对生活有理性的理解，你对于你所研究的这个问题领域有了一些了解，有了这个理解了，我们就可以去思考问题，去求解问题，去阐释问题。而当你把你的思考、理解转化为问题阐述时，理论就产生了。这就是理性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理性是理论的这棵树的土壤。理论的树在理性的土壤上茁壮地成长。

所以人家现在呢你想研究什么课题，我想要追问一下，你现在拥有的研究理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要说大家，就像我这个年龄的，比我更大的一些前辈们，当下都陷于混乱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当下时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前的合理，现在不合理。先前的合理的秩序，现在变成不合理的秩序。所以要重构秩序。而理性前面我说的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对于这个领域之中的有序性的把握。这个有序性被时代否定了，被社会自身否定了，不是对既有理性就是一种否定。当既有理性被否定的时候，而新的理性又没有形成，那么大家想，理性能不混乱吗？

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进入到新世纪这段时间，整个的代表着理性说话的理论界，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对于中国的娱乐、对于中国的文学，谁掌握着可以判断的标准？没有谁敢说“我掌握着”。所以从后现代的角度说，“去权威性”正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理性建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大家都在摸索。但是大家要知道，任何理性的建构，它都是原有理性基础上的升华。所以尽管前辈学者、你们的导师们也在摸索，但是和你们的摸索不一样。他们有原来理性的深厚根基，他们在里面进行引发之后，他们建构自己的新的生活秩序，就是新的理性，要比你们现有的多。但是轻易是轻易，混乱是混乱。现在是整个理性混乱的时代。你们瞧，我们文学理论吧，每年一个年会，到现在为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些年会讨论了23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认真讨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为什么呢？就这些问题要想深入研究，你研究的根据不就是理性吗？你没有超越的理性，你怎么研究呢？

1997年，中外文学学会的会长钱中文提出了一个新理性的建构，这么一个命题。并且我为此写了几万字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按理论说，一个协会的会长提出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这个协会是不是应该蜂拥而起，以他为核心，展开一遍又一遍的研究，逐步地加深呢？没有。就是开了一次会。再有哪些呢，就是钱中文先生从事理论研究多少周年纪念会，一些学者去，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出了个集子就完了。问题还是在于，怎么深入？你比如说，钱先生当初提出的理性，他说我们要建设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要有理性的指向呢？钱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取向于哪？他认为取向于西方的启蒙精神。西方的启蒙精神在西方都已经更改很多了，不断的 changing，被现实突破着。我们在这样根本不是西方理性的情况下，仍然把西方的启蒙精神拿过来，怎么指导性建设呢？就很难指导了。所以从他提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理性取向究竟在哪。这个问题今天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在各种现象性的研究之中，混乱就是难免的。咱们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很多。这些说法本身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学是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学学本质论解构了，解构了才有这么多之多之说嘛，不解构就一个说嘛，大家跟着说不就完了？去学嘛，你们在文学学的这个文学理论这不都是当作既有的理论去背嘛。现在在这些东西可能在大学里还在背呢，你不肯不行，总得考试吧，你考研究生你得有个标准吧？但实际上，从理论角度说，它陷入了困境。再说文学功能论，这是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文学功能的传统的四大功能啊，审美功能啊，教育功能啊，认识功能啊，还有这个娱乐功能等。今天除了娱乐功能在面向大众的文学中最先发挥了作用，它的认识功能，连作家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我们最近呢，就是辽宁搞了个文学特等奖的评奖，有散文奖、小说奖。当时这些作家呢颁奖之后呢，有些评论家还是按照以前的标准说，文学要认识生活。很多作家当时就提出质疑，“你们搞理论的讲讲今天社会怎么回事？你们搞理论的都讲不清楚，我们搞文学的，用形象去认识生活，我们认识什么生活？”这个作家他根本不按照认识生活这个去理解，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能认识生活。第二个，教育功能，如果按照教育功能的话呢，我们的红色经典那肯定是具有教育功能的，教育了一代人，可是这样的作品，今天还能上架吗？推向市场，能唤起90后那帮的接受热情吗？另外还有哪些人能够潜心到地文学中去受教育呢？现实就是最好的教育，在这次竞聘中我失败了，下一次我一定要竞聘成功。我博士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那么你找到了，我怎么跟你学。这是现实的学习，谁到你文学中去学啊？所以这类功能现实地消失了、淡化了。那么以前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理论之说，自然就失去了它的正确性，变得没有价值了。所以由于文学理论本身在全方位地被解构着，它也陷入了混乱。于是理性的混乱造成着理论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又使得理性的混乱失去了自己理论论述的清晰。这种情况要想解决，就必须面对理性问题。这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文学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谈理性建构的当下意义。这个就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理性。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研究理性，它的当下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若要谈一谈理性建构的状况。这个就是我们的命题是什么呢？理性批判中的批判理性。理性随着社会的转型，黑格尔所说的现存的都是合理的不再存在了，因为现存的不变成了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所以要寻找新的合理性，才有社会转型。可以说这么大的规模的中国社会转型确实是政治推动。如果大家有邓小平当时运用他在中国的最高的政治权威，提出改革开放的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靠自发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是很难疾风暴雨般地大规模地这么强势地展开的，但是政治发动之后，这就是一个滚动的轮子，从高坡滚下来，越来越快，快的速度、在快中弹起来跳跃的程度、飞跃的程度是最初的策动者也预想不到的。这就是大规模的转型。在大规模的转型的过程中，最初批判发动不是文学理论家，是政治家。是四人帮粉碎之后，在四人帮时期活跃的，具有绝对位置的那套唯权论的文学理论陷入了绝境，它随着那个时代陷入了绝境。所以不是谁想批，谁不批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套理论必须批判。于是理论的批判就此开源。但是大家要知道啊，理论的批判不是不需要批判的武器啊，那个时候有批判的武器吗？那个时候的一批学者们拿什么批判呢？更何况，那个时候有批评能力的学者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并且传授这套理论的学生，他们必须自己批判自己，没有别的批判。当时的大学生刚刚入学，像我是77届大学生，我入学的时候，那文艺理论，我哪



这些他们所编著这些理论的承担者，他们都是痛苦的自我批判者，他们有话要说。再加上当时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问题，那么一擦，教材就出来啦。所以教材的大丰收并不是理论的大丰收，因为那个时代理论贫乏，批判的武器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只是大家有这个期待，有了学科主体性的期待，马上进行了解渴。

真正的批判武器的获得就是大规模的西方理论涌入。大规模的西方理论涌入使中国学者有了新的理论材料，有了超越的底气。这个涌入的价值和五四时期就是中国现代性启蒙时期西方涌入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为什么我觉得福柯那个谱系学非常有价值呢，他说历史啊不是一个时期延续过程，历史是有相似点的不断成熟。这些相似点合在一起形成谱系，这就是谱系概念的理论。你看我说这个美的规律，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到的。人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找的。

那什么是美的规律，所有的讨论都想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自己的真实的根据。朱光潜为了找到自己的真实根据，专门又坐下来，颤颤巍巍的拿起他的笔进行巴黎手稿的重新翻译，所以那形成了一段时期的理性批判的批判理性，就是在马克思那里面筑起似得寻找自己的理论。这段期间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之后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成就了气势了，西方的东西大量的涌入，首先涌入的就是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这一批学者，所以这一批作品呢，它就好像五四时期中国启蒙时期一样，靠着那些学鼓起的在政治当时就对政治文学之下的这些学者们可以爆发个人的能量，因为凡是读尼采的，不会燃烧起个人激情的很好，一下被燃烧起来了。当你飞向四面八方的时候，除了时间陪着你飞，什么也没有，多么景气凌人啊。这一下子解放了，紧跟着解放之后，一批人就开始研究，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理论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主体性被强调出来了。刘代付当了文学主体论。刘代付的这个文学主体论当然是他自己理论提出，但这个理论提出是当时学科需要自己学科理性的时代呼唤。用他的话说就是每个时代你说什么不是你想想，是时代在于你说。海格尔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不是语言之说，是道让语言其说，是语言说让他说的大道。那个时代，文学需要找到自己的主体性，需要找到我们文学学科的自立者，文学学科领域自立了。刘代付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的阐发，他成了文学主体论今天你不可能不提到的旗帜性的人物。有三年的时间，这个是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包括这三年的时间，就是为文学理论著书立说。这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大学语文教材大丰收的时候，各个学校几乎都写自己的文学理论教材。当时有人统计嘛，全国几乎有230多个语言教材，这些教材说什么啊，回过头来把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段时间间转过来的苏联体系，还有我们各自构建的理论体系，再加上筑经之后找到的各自理论根基进行梳理。梳理之后，按照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大家都知道了怎么遵循这个框架：文学本质是什么？文学功能是什么？文学构成是什么？文学批评是什么？文学原则是什么？有的就是是八大块，有的说十二大块，这里面以童庆玲先生为代表。这教材就推出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寻找学科主体性，在学科主体性中为理性批判提供批判性的一个特殊时期。换句话说，它也是既有理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价值在批判中完全自我坚持的时期。因为大家看那个时期啊，我这个过程出这些200多部文学理论教材的带头人，他们都是我的导师那一类的，他们都是先期

的生活，你可以坐豪车，你可以住豪宅，你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读博或者做更好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生存诱惑，带来什么呀，带来了文学家和文学理论界向着大众文化的集体性的涌入。

这种涌入体现在文学理论上，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理论边缘化了，文学理论必然扩容。所以文学理论扩容的问题在2002年被明确提出，提出的代表人物陶陶钰。他提出文学理论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够专门的研究文学，而要研究使文学成为文学的社会上的作用力量，当下就是大众文化。当时有一批学者，也包括已故学者于洪，他的一个明确主张就是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文学的边缘化导致文学理论的边缘化，文学理论和文学要想从边缘重返中心，必须冲破现有的学科限制，打破大众文化，必须冲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学性现象。所以文学性这个概念在04 05 06三年时间成为都能把人烤焦的炙热概念，人人都谈文学性。为什么谈文学性啊？因为借助于文学性，你就可以研究生活、研究服装、研究时尚、研究广告、研究装修。在那段时间里面，各种广告类的研究、时装类的研究，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那这里面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这种由大众文化引发的边缘化。咱们回顾一下，刚才我讲过吧。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它是在文学找到了领域主体性之后，出现的骤然性放开。文学领域主体性就是文学向文学回归吧；这个信息论、控制论、传播论，不是传播论，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论。这三论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全国的各种会议都是围绕看它们的。我们文体学里面研讨三论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林兴宅的《阿Q性格分析》。他非常好的把系统论引入了到文学阅读之中，形成当时的一种主流。接下来就是各种流派了，开始研究，跟着西方的走。西方有什么我们研究什么，西方谈本质主义我们就研究本质主义，西方谈后殖民主义我们就研究后殖民主义。西方的这些作成体系涌入了，比如结构主义我们就研究结构主义。

到90年代叙述学涌进来啦，全国就开始开始叙述学。整个西方引领着中国的理论思维。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西方理论成为了解构现有理论的强而有力的武器，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人发现了，这是一种绝学。这次发现在1998年文学理论在陕西的一次会议中由曹申庆提出了一个，我的话就是说石破天惊的结论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得了失语症。他说，把我们这么多年的著作拿出来看一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有多少是我们的自己的理论话语，全是西方的。他的这个一提出出来之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大哗然，哗然！很多人好像突然面对着一个悬崖般的事实。怎么办？这个时候正在文学理论本身陷入到已经混乱时候寻找自己的语言表述，寻找自己新的理论立场的时候大众文化繁荣了。大众文化繁荣是中国文化失语性自觉几乎同时进入生活主潮的时候。大众文化这场争论呢接近了八年，逢会就争。当然不是董静敏和陶东风之争。师生之间早已经握手言和。董静敏呢变的也越来越宽容大方，而且也接受了文学扩容这个事实。在2011年文坛坚持不该扩容，就不要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大公众同时对于精英群体的一次冲动的行为，我把它称之为事件。在这个事件之中，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你，你不接受市场你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进入到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获得光彩，可以被大众传媒去传播、追捧。你可以获得你想获得的贵族般

研究绘画的、研究朱元璋像的、研究陶瓷的、研究什么样的鞋耐穿又长久的。完了之后，整个这个大家都怎么办呢。这是。但是文学扩容带来的混乱从理论上怎么面对，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讲的清楚。我去年写了篇文章，现在还没有发出来呢，就是咱们文坛扩容带来的文论的学科领域性。要不要文学扩容，扩容是不是没有变，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大的表述是不是说明了在文学批判时代，批判理论的形成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混乱啊。那那二三个问题要排出来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这段理性混乱的时间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到2001年我们从80年代末到2001年这样一个思路的梳理大家就应该明确理性问题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在理性问题中有这么几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文学是人学中提出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问题呢，在80年代形成过一次文学理论界的一次集中讨论。那次讨论就很明确，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把人的尊严找回来，所以那是一种生存性的文学精神。人需要自由，人需要自己的能够言说。能够放心大胆生活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应该给予保障的。再有人需要感情自由，需要感性发放的自由。这种讨论中呢借助了尼采，借助了弗洛伊德，借助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这是第一次。但是这次讨论很快就随着大众文化的繁荣，思想经济的繁荣消遁了，没有深入。到了97年、98年，钱中文提出心理性精神建构之后，形成的另一个问题。因为钱中文在心理性精神建构中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被物化了，人被权力化了，人被金钱化了，由此三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混乱。我们就是要通过心理性精神来调整，来清醒，来面对这种混乱并给予理性的引导。钱中文当时提到的人被物化成了成为第二次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理论概念点。第一个热潮是人被政治化了怎么找回人；第二个是人被物化了怎么找回人；于是就有了理性精神中大家知道的目论和工具论，人性和方法论的争论，就是你怎么实现人性？这个问题又成为跨世纪以来一个争论的要点。那么这两次人文精神的提出和随之而来的几百篇重量级文章的写出，它说明什么？它说明明确主张只能是语境性的。第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不可能推进到人物化时候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语境中不存在。

而第二次当人的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怎么从物化和工具论中找回自己人的位置的时候，也不再会重复以前人该怎么样离开过去去生存这样一个老话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讨论两个问题的兴起，它证明着人文精神的理性化。大家想如果我们离开了当时的语境来论证究竟第一次理论论证更深刻还是第二次理论论证更深刻，有什么价值吗？第二次是当时开始在第一次中就写文章的学者们经过七八年，他们写的更成熟了，他们对人的理解更充分了，那肯定也是更深刻了。但是从语境说没有第一次对人的生存自由的唤醒，没有第二次。所以从这个人跳出一步讲，我们面对看语境，面对着古代文论，离开了他们当时的语境评价谁高谁低，在谁有体系谁没体系上做文章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话也是资料价值而不是理论价值，思想价值。所以回过头来再强调一次，一定要找到属于我们这个生存语境中的问题，用其他的资料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理论上的真谛。阿尔卓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式概念，他认为任何理论问题都是从问题深入，问题之中的问题结构。理论家思想家的理论就在于他的问题结构，是结构推动着逻辑的展开。那这个结构是什么体系？那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要点问题，就是人文精神大讨论。

接下来，排列下来的第二个要点，是传统转换。传统转换在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启蒙在传统转换。鲁迅被称为启蒙的先锋，启蒙的旗手，就是这篇《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中大家最能够普遍了解的话，就是“孔子那套思想是吃人的利器”。这个就是当时的传统派。当时传统派的经验呢，有些学者轻易地批判说当时不成熟，不能那么说。当时有当时的语境。当时是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低谷的时候，陈疾在身。我们知道，医生要想治病疾，按照西医学的方法治，开刀就可以把陈疾拿出去，开刀就是身体的毁坏。但是你身体不毁坏能治病吗？所以从当时中华民族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这些疾病进行治疗，是不是很合理的嘛？所以站在今天说它不合理，那是一种不考虑历史语境的的做法，那绕不开的。要不你就别治这个病，别治这个病现在就没了，这是批判学案。但是批判的历史必然性不等于批判的当下合理性，必然的必然性不见得都是后来合理的东西。所以黑格尔向前推，“存在的”是合理的”，但必然的对于后来的发展

· 沙龙拾粹 ·



来说未必是合理的。五四的时候发起的、形成高潮的传统批判，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倒掉了”。其实传统中的东西不是你想批判就批判的。大家说传统在哪？传统不是武功，传统不是大雁塔。那是传统的物质形态。传统就在你们的父辈、你们的身上、你们的孩子那里延续。我们能避开传统吗？如果我们没有传统，我们转向西方那么容易的话，我们何必在西方的逻辑面前这么长时间还觉得很难以驾驭？那是传统。蒋孔阳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他把传统的那套思维引入到他的那些理论中去了。

而这套思维正是今天我们寻找和建构的。在蒋孔阳写理论著作的那段时间、参加第二次真理大讨论的时间，正是中国二元论风行的那段时间。所有的传统研究第一个要分的就是谁是主观谁是客观。当时就有一批人研究麻子子是主观的孔子是客观的。然后大家就争论啊，这个为什么是客观的那个为什么是主观的。还谈庄子（此处口误，应为孔子）还不能算客观的，真正客观的是荀子。于是呢探讨传统探讨历史就变成了简单的主观客观的贴标签。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它是强调物质第一性的。那么客观的自然那就是革命的，主观的就是唯心的。当时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思维，所以政治的批判在思维中延续着，以至于在第二次真理大讨论中，它成为了热点。而就是在这个热点的过程中，蒋孔阳没有说谁是主观的谁是客观的，他强调关系。他说不要说主观客观，这是一种研究者的设定。他说美、文学、艺术，它就体现在关系之中，是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什么呢？通过相互作用关系的现象建立起关系体系。而这个现象，就是艺术现象、审美现象、社会现象。我们就要通过现象的研究来解决构成现象的双方。所以在蒋孔阳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他专门研究变化生成的问题。今天有人中午和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就是完全不同意西方的思维。大家知道这个海德格尔，他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他不断地引用一个诗人，格奥尔格。格奥尔格的诗里有一句话：于是我学会了弃绝，语言破碎处，世界无存。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语言不能网罗，在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语言就是存在之家。可是中国古代呢不是这样。中国古代谈到至高的学问是语言不能研究的最高的学问，不能研究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那个道你能说出来就不是道了。《易经》中揭示的是什么？都是非语言的东西。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语言说不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呢，立个相。大家看，用语言把握世界的西方，和主要不是用语言把握的、或者认为用精华语言不能把握的东方和中国，他们都在把握着世界。这能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西方的世界，必然是语言把握的世界。语言不把握的世界，他们知道生活中存在，那不也是个玉吗？也知道非常美好，但是对于理性社会是没价值的。而在中国呢，有价值的恰恰语言说不上来。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在这个关系体——蒋孔阳强调的关系体中，他特别注意流动的东西、变化的东西。西方的流动变化的东西是不能为语言所把握的。所以在西方的传统学术场合中，是不研究流动，不研究变化，没这个位置。研究的是稳定的，研究的可以是本质确定的，研究的是可以在历史中见出必然性的。偶然的、变动的、现

象的、生成中的东西，因为它不能够为概念所把握，因此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可是我们中国古代——你们可能不熟悉。为什么不熟悉啊？就是中国古代有很多范畴。你们在大学时代接触过，后来要说研究呢可能机会也不多。比如说在刘麟的《文心雕龙》中，他有一个核心概念：风骨。这个风骨究竟讲什么，到今天大家也还没弄清。什么叫风骨？风，就是中国古代讲那些生成变化的时候，因为不能为语言所把握，故立相以记意。怎么立相呢？要取譬起来。取譬呢就是，举个相你在生活中看见过。像这个风，谁都不知道风是什么玩意儿，吹到你身上就知道了吧。他把这个拿来，告诉你这个风啊，就是文章中这种流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也知道语言说不了，就给你立个相。那么骨是什么呢？骨是构成文章的文字内在之间的联系。有些人理解骨就是坚硬，不对。骨髓是非常灵活的，正因为灵活，人才才灵活。它随物而变，讲的就是变化，变化中又坚硬的那些东西。文章中的情感啊语气啊，流动着的东西，成为中国古人重点把握的精华。风骨是如此，气韵又何必不是如此呢？气韵生动，它就好像你喘的气一样。刘麟讲，文以气为主。他为什么讲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不可强为之。讲的就是，在那里流动的，有的很柔弱很委婉，有的很刚硬很坚强。这东西讲不出来，但是确实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来看，我就举这些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吧，西方研究的是确定的、稳定的、必然的，而中国重点研究的，是生成的、流动的、变化的。那么，西方的世界里就没有流动生成变化吗？有。但是在理性中被摒除了。中国的社会中就没有稳定确定必然的东西吗？也有。被我们的思维方法摒除了。所以用我的话就是两方面各自掌握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合理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只有融合起来，才是我们今天的理性建构的出路。

而在那个时候，蒋孔阳能够把这套方法深刻地提出，由此建立他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不是因为他在87年就开始研究蒋孔阳，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不是这样。这位先生确实了不起。他既要有一种学术勇气，又要有一种对传统的深刻的理解。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中西方在对待传统上，都有自己的传统，而我们批了传统之后，要找回传统。找什么？找不同于西方的东西，找这些年按着西方的思路我们滤除的东西，忽略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找到的。所以在传统转换问题上，发生着一系列的争执。有一些人认为传统是不能转换的，传统转换完之后，就不再是传统。所以九十年代末，我上次提到的文学理论协会在陕西开的那个会，出的那个小册子，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用了转换这个词，就表现了一种坚持——传统是应该转换的。而且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转换着我们的传统。我们中国的企业，你怎么说，传统中的那种人论中国，你是有情。为什么西方的很多企业到中国，直接遇到的矛盾，就是那个人情味。他们面对着这个传统，所有进去的工人都带着这种情绪，你不可能把他变成一个只追求个性、不讲求人伦的这样一种动物，它不可能。所以呢传统经过转换已经当下化了。它成为我们今天的行为性，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普遍坚持的一些行为模式。它也成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交往形式。像中国的“孝”，中国对于“家庭”的那种理解，

中国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性的理解，明显地不同于西方，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那么对于传统的认识，由批判到找回，由跟着传统亦步亦趋——像前一阵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一样，被动地研究——到今天能动地转换出来，这是文学理论界经过近三十年一步步深入探讨，取得的现实状况。不能说成果，取得的现实状况。也叫所取得的当下的理论征兆。

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论中化。文学理论长时间面对的问题就是，西论怎么转化为中国的，就是西论中化。这个问题在近些年来变得尤其其得成为显要问题，理论的显体。为什么呢？在五四时代，我们是接受了西论。但是很快被接受的西论就中国化了。在现实生活中，在革命斗争中，都中国化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整个马克思主义转化的经典著作就是毛泽东著作，那里很少出现教条地照搬西化的东西和文化思想。它有着鲜明的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针对性：什么抗日持久战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革命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啊，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问题啊，什么游击战的十六个字方针之类，都是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和他带领那一帮的共和国的开创者们不时地用西方理论去解读，但是转化了，这个是转化了。紧接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列强被驱逐出去，那种在五四时期燃起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情，被对西方仇视的热情所取代。理论界不敢碰，老百姓仇视；对于美国佬一提的话，那是发自内心的仇视。就在他的敌人，那他们自己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一次五四式的循环，断裂又循环实现了。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他谈到现代性的形式时谈两种现代性：一个是循环的现代性，一个是类型的现代性。他为马克思解释这两种现代性的时候用了这样说的：循环的现代性讲的是断裂中的某些因素的循环，类型的现代性讲的是循环以类型形成差异，这是解释很对。就是从历史本身它就是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就是断裂式的循环。五四和今天断裂了这么多年。但是那种接受西方的现代性循环而来，也就是谱系，也就是现代性吧。类型的现代性讲什么呢？讲虽然是循环，但不同的循环阶段有不同的差异。那么现在在我们看，按照这么说，有循环而来，这个在对西方的接受，是五四的同向同幅吗？显然不是啊。它的差异性，不仅在于五四是被动地接受，而这回改革开放是主动地接受，不是在这个状态上。它更重要的是，在于接受之中自己的选择性变了。五四选择的是民族救亡的西方体系，今天选择的是民族发展的。但是，两次转换面临着同样问题，都是对于西方理论的非语境化的套用。正因为是套用的，所以它就有点问题。例如一段时间，对于西方的这些理论家，尼采啊叔本华啊这些的套用（还有）康德、黑格尔，尤其是表现在相当一段时间对于马克思的套用，也就是教条主义。第二次，这个套用的时间，虽然至今开始发现，开始转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刚才我说的陶东风。我在会上我就直接说，他也接受这个说法。就是什么说法呢？就是他的很多的文学理论的东西，都是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标准去衡定的。就是他理论批判的根据，也是他理

论坚持的根据。西方说本质主义，他就认为中国理论就有本质主义。有没有？有。你比方说对于马克思的一些语言的应用，把它作为一种唯理论的本质，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是怎样在实践中升华理论的问题。不是反本质的问题。是怎么揭示那些稳定的一般性的问题。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你给它批了。我们缺什么批什么，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再有像西方出现的那些新的东西，这个后殖民啊，它就认为我们现在这种西方的引入就是一种后殖民，就是接受全套。这恐怕把它作为一个殖民立场而接受西方的中国学者不多吧？所以不能这么简单地讨论。

当然我同时认为陶东风的这个教材是最有创新性的。他讲了很多别人没有提到的。他在理论建构上的意义比他某些地方的疏漏要大得多。而且他是我们协会中最年轻的副会长，非常有活力。那么既然如此，一次循环，两次引入，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对于西方理论，离开语境去钻研，就是面对西方的问题。如果西方的理论不能够纳入到中国的语境中，西方理论进来就纯理论化了。

纯理论化有什么价值呢？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它只有论证中帮着你说话的价值。本来我们的理论就远离现实，再来一个只会帮着说话不能转换为实践的西方的大师之说，那我们的理论最后就只能没饭吃了：没人用你了，文学界也不用，批评界也不用。理论界这点人跟这儿一坐就研究了。这样的话呢，怎么转换西论就成为文学研究，特别是2005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中大家发现，转换西论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主体性。这个理论主体性这些年就被转换为一个非常适合于与时俱进的口号，就是“中国特色”。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以该理论作为我们的体系，去消化西方的东西，转用西方的东西，引中它的东西。这个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在2008年以后，连续三次会议，研究这个东西。很多学者投入了讨论。这个讨论，起码得到会的学者们认识到，对于西方的东西，不能盲目地接受。讨论中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学有没有体系。讨论的结果就是多数人开始接受，中国文论是有体系的。中国文论很多人反对有体系就用中国古代文论的那样的一种撰文形式、随意形式。因为确实中国古代像我们《文心雕龙》这样的，是很少的，多数都是只言片语。这个只言片语不是就没有体系？我的看法：中国文论的体系是大一统的体系。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的大一统。为什么这么说？哪个体系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各种说法的内在联系，这个联系已经相当的稳定，并且能够通过它不断地面向现实进行稳定，又能收拢回来。中国的文论体系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言外之意的表达的 问题，抒情的特色问题，情景交融的艺术问题，动态把握生成对象的趣味问题。这些根据在历代的人文中都坚持着。已经坚持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坚持到）任何一个学者，只要稍懂一点中国文论的，跟你谈“气”，你说不知道——别看大家都是外国文学的博士，“气”不是你们研究范畴，知不知道什么叫“气”？中医用，文学用，都知道吗？——“神”，不知道吗？《易经》，不知道吗？你就想这个范畴用了两千年，不用任何直接交流，直接评价，这体系

该何等的严密？咱们承认黑格尔体系严密，但是知道黑格尔的西方人有多少位？它已经普及到了，经过它严密的体系的摸控、一个传播，普及到了普通的老百姓那里了，不仅是文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个体系。而它从把握对象的方法论的角度说，它有自己的的一套方法论，就是动态的、流变的、整体性的一套。所有的中国古代文论里都能找出这个特点。它跟西方用逻辑斯主义去把握对象，用逻辑去把握对象，一样，但是，相对，都是贯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体系，那么我们怎么进行我们的转换？今天进行主体性转化，把它变成我们的主体性之后，再进行西论中化，我们就有话说了，就有根。就像我一篇文章中比喻的，就是你身体健康了，你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才能消化；没有说别的东西可以直接进入你身体，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必须消化，消化就是转化。转化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同化”。你把它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必须析其之间，转化为己。当同化不了，就要将对方调整，调整之后和对方接近了，再把它吸收转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学之后，市场经济有用，那就是一种调整，调整完之后，在我的基础上，再消化。在西论的使用中，在中国的文论中，充分地体现着什么，体现着碎片化。因为我们不可能非语境地把西方的体系完全拿回来，它也不适用，变成什么呢？变成这段话，需要引用一下，不管他是黑格尔的是康德的，或者海德格尔的是福柯的，甚至他们互相之间都骂得叫爹骂娘了，我拿着往那儿一贴，下面紧跟着就是他的。这一贴不要紧，理论不就碎片化了吗？理论碎片化是中国现代的文论建构中，作为典型的后现代现象，被实行了。到哪碎片化去？到理论中找去？咱们看看现在这些教材，到什么程度了？什么叫文学？他把前面几句话，翻过来，这边，西方的，下边，中国的，再一个，当代的。根本不不着边际的这个就在一起拼啊，现在教材都这样啊，你们看看这几个教材。什么南帆的，什么陶东风的，还有重庆教的，就是这套。这怎么能叫教材呢，一点也没有啊，你们讲讲他们之间的差别呀，不讲，你自己读去，资料性堆砌。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理论主体性没有形成。四点三十一，是不是？留点时间大家互动互动。最后我这儿还有很多东西，我就不讲了，大家动一动吧，互动互动。

主持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高教授精彩的讲座。（鼓掌）我觉得听了高老师的讲座，我这儿也是失落了，但是失落之外呢，我还是要表述一下啊，总结一下。高教授以扎根于中国现实实践的问题意识，站在整个世界学术的视域下，以中国学者主体性的话语控制权为追求，为我们条分缕析地分析和论证了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提出重构理性秩序的问题。高教授的讲解使我们既明白了中国文论在时代大潮中流动的现代性问题，又切实地帮助我们，使我们看到了今后我们从事研究的，着力的方向。当年孔子韶乐之后呢有余音绕梁三日而三月不食肉的说法，我想今天呢我们听过高老师的讲座，可能也会体会到这种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觉。可能三年也不为过，因为对他我们今后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助益。高教授的讲解可谓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离。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就已经激起了很多思想的花火，所以呢，现在呢，给大家时间，高教授刚才也表达了，非常愿意和大家进行这种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看看下面的哪位老师或同学有问题，我们可以请教高教授。

男同学：高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座我是很受启发的，但是呢我也有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在做博士生的课题也是西方的文论，但是我想想知道您把理性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建构想下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理性为什么说不能引导现实，就是说理性对现实的引导作用力很小，就是说，说现实，我们要建构理性的同时，还要让理性来引导我们的现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矛盾的。然后纯理论的问题，我觉得纯理论，因为西方从古代一直研究正义论，一直到现在它都在研究正义论，这是正义作为一个纯理论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研究的，但是在中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个体系，所以我想知道，纯理论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是否有体现，因为你讲的这些理论问题都是跟我们有现实社会，比如你讲的这些理论问题都是跟我们有现实社会，比如你讲的文学理论思潮的转变啊这个，上世记的系统论，还有这个世纪的西方文论大量引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现象。我就想问，纯理论，我们应该如何建构？

高健：恩，现在这么说啊，就是你刚才提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理性吧，它对于社会的引导，我先从这个角度给你回答。就是这个理性呢，它是在生活之中的，它不是引导之说，它是生活的有活性，对我们，通过生活的过程，接受为我们的理性。有序性在生活中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是

历史的形成过程。那么有些东西呢我们没有发现，没发现的结果怎么样呢，它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我们就不能够按照一定的秩序去把握它，它就不属于我们。所以现在呢，虽然理性混乱了，是生活本身在自己的混乱中，逐渐地进行着新的秩序的沉淀。这个问题啊，就是马克思韦伯他提出个命题，就是“混乱的秩序”。其实是这么个命题。什么叫混乱的秩序呢？就是有一段时间，虽然混乱但不乱，你像我们今天社会这样是乱的吗？是有很多乱的，但大体上我们按照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它是不乱的。这就叫做“混乱的秩序”。接着“混乱的秩序”慢慢地，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呢就是，经过碰撞，很多弱势的力量，弱势的因素消失了，强势的因素呢稳定了，那么这些东西就作为稳定的秩序，逐渐地沉淀下来。就会由混乱的秩序转变为稳定的秩序。所以这段时间呢，社会自身走向了有序性，新的有序性。理性是伴随它而生成的。所以理性不能够指导的生活必然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生活就是混乱的生活。它不能指导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不能指导生活，所以要把理论和生活区隔开。我们今天很多理论是不能指导生活的，因为它们本身没有把正在形成中的理性按照形成状况，进行理论的提升，进而做到理性的表述。有很多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或者是昨天的合理性拿到今天去用，它当然不能指导实践啦，那这是理论。第二个问题是纯理论，纯理论是什么意思呢？纯理论，应该说，今天的纯理论越来越少了。纯理论的时代是笛卡尔开的头。笛卡尔设定了世界三大实体，就是上帝，人和物质。上帝呢创造了后来者之后呢他就管之不管了，所以世界上实际上是两种，就是人和物质。于是呢，这就是二元论的由来。

人怎么称之为人为呢？人思而为人，所以我思故我在。那么思，它自成体系，不需论证，唯一坚持的就是思维逻辑。这就是纯理论。它不需要在物质中论证，也不需要有用。物的世界呢，不知体，是不可知的，所以他设立了对立的两极。后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对纯理论进行思考，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注意到，如果理论仅仅就是在思的纯理论范围内，就是马克思后来提的经验哲学理论，那么理论必然无用。所以后来你看呢，从这个非西特，从康德，康德虽然研究了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这个思的经验结构，但是紧跟着他就开始了他的实践的检验。

在实践领域的研究呢，他把理性开始向实践展开，开始在实践中建构，他最有启发性的一个结论，就已经不再是纯理论的了。他谈到道德律的问题。他说人究竟是因为道德而幸福，还是因为幸福而道德。他说这个问题不能做分析的研究，要结合着实践进行相互的中和研究。进而他就认识到了，不能离开现实单独研究某个问题，单独分析是不可能的。到了黑格尔那里，黑格尔美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把分开感性的领域中和起来了。美就是理性的感性显现么，对不对？他给中和了。这一个中和意味着什么？就是纯理论，通过德国古典美学开始进入到社会，开始进入到生活，开始进入到感性世界。所以从那以后，你很难再有纯理论。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谈纯理论呢？就是西方的理论离开它已经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种理论诞说，就是一种理论诞说，没有现实针对性，没有中国的现实根据的理论，又回到了纯理论的故辙，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纯理论在今天，实际上，除了离开语境的生搬硬套，它是没有的。那么纯理论，这样的理论，离开了西方语境被传入的理论，有没有用？当然有用。这是肯定的。你比如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作为主义，在中国它没有形成理论的系统，所以中国没有实用主义，只有实用机制和实用性。但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对于实用主义机制的很多问题，从理论角度，给我们没有理论的实用行为作了理论解释，所以，它有阐释价值。譬如那个时候我们引用伽维马斯的话是，我们不再是引导人们怎么生活，而是向人们阐释生活。那么至于西方说的非常精彩的，又有逻辑联系的，又有自己语境根据的，这样的一些理论，虽然离开了西方，到了中国，但是有一条，刚才我讲西文风化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我没做强调，人人的生活语境中有多大差异都有共性。你就不谈西方理论，你不知道福柯讲的那段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但是那番话它合于的那个语境，虽然带不过来了，但是由于语境的共通性，我们也就是说是很多因素可以为他所用，就不可以转用吗？而且人家在严密的逻辑之下，用概念构成的那些陈述，确实比没有理论建构的人讲得要好得多，要高的多。你的理论中引那么几段，那就是药引子，那就是精华。因此呢，就是没有语境的西方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也有大裨益。我本人的研究呢，就是很多地方引用西方的理论。就是使我的说法呢更令人信服，也显得更加直气壮。

主持人：好，感谢高教授精彩的这个论证和分析，回答了这位同学的如此高深的问题。下面还有哪一位老师和同学有问题？请争取这次宝贵的机会，畅所欲言。好有请这位同学。

男同学：高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把三十年前的中国如果刻画成一个左，那现在，从另一面看就是一个极右的情况，那从三十年前到现在可以说是一条线性的发展，从左右到右，没有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停。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话，是不是所有的理论都会显示出它的暂时性，因为它解释的就是暂时的问题。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些问题似乎是解决了，或者乍看之下是解决了，或者说是无需要再解答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最最近在读矛盾文学奖的小说，这些小说应该说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1990年的一部小说《都市风流》，它讨论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问题，它讨论到了2000年左右有一部叫《时代英雄》，它讨论了当时中期改革面临的一个问题。再到最近的那一部，倒退看齐之前的话，这些理论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都已经解决了。再往后推十年，又已经有一个自然结果了。再是否否定了，就是在理论上我，我提出的这些个问题，也许是一个短命的，或者是暂时是短命的，过几年就没有价值了。我想提这样一个看法，请您这样看，我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一定道理？谢谢！

高楠：恩，我这么看啊。你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理论是有价值的，或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写了篇文章，针对了某一个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呢淡化了，或者呢不作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了，那你这篇文章随之意义消解了。不是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这个理论现象，而且可以说呢众多的理论都必然是随着历史的淡化，涉及到的问题，但是要注意性的是什么呢，生活中总是以相同性和相似性在不同的问题中重演着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中必然有这个问题的问题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意味着在新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是就拿新的理论立论，但是我们先前的理论可以拿过来思考的，我们今天就证明，两千年过去了，我们在论语中发现了大量的和今天非常切合的说法。这不就是意义吗？那么孔子当时对待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要找回周礼的时代，要拉着社会向后退的历史局限性，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说的那些话现在还能用？因为他说的是人，人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问题化、语境化，很多东西是不变的。你像孔子当时一句话，对他弟子要求：“入则孝，出则悌”，就是回家你就孝，出来你就讲那个信誉是吧，“谨而信”，就是小心谨慎地追求信誉，“泛爱众，而亲仁”。讲了这番话后，他说了一句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多精彩啊，就是说你有了很多道德，有了很多美德，有了很多知识，但是你不完善。你要是想行动起来，那么你就得学文。什么叫学文，不是说学中文，不是这意思，要学会使自己礼仪化，文明化，文质彬彬那种人。这只是对于一个人的完善性的塑造。在那个语境中，他跟他弟子，他也死了，他弟子们也都死了，今天我们谁都不是他的弟子，但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价值吗？所以理论的价值在哪呢？不在于它当时求解的问题，而在于它问题求解中，涉及到了多少理论永存的那些东西，终极的东西。这个终极的东西说不透。老子那个《道说》你好好看一下就知道，终极的东西说不透，但是你在痛苦和压抑中要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提升上来，你就理论了，你就理性了。所以应该这么认为，当你理性，理论和理性，理性和感性它们是一体化关系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要想开发自己的感性，只要在自已有理性上向感性投入，你就可以更多得占有感性。任何一个人，你在感性中没有理性，那么你来谈谈博士，你就很快乐理性了。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你就由此断绝了感性，或者由此隔绝了理性，它们应该是一体化的，而真正的比较让人感觉到愉快的，你们自己感觉到愉快的就是，理性和感性应该是和谐的，不应该是单项的。

主持人：谢谢高老师！能看出大家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今天的提问只能到此为止。我隆重地向大家推荐一下，高老师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本理论论著作，它的名字叫《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在网上是可以购到的。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文本的阅读，继续和高老师在精神上获得一种交流。

主持人：好，那下面还有几分钟时间，请大家抓紧时间，还可以提一个简单的，用时间比较少就能回答的问题。看看哪一位同学或老师有问题。

女二：高老师，您还是一个文学家，我看您的介绍。文学应该是重感性的。然后您又是一个文论家，文论又强调理性。您怎么把理性和感性结合在一起呢？

高楠：其实是这样啊，感性理性呢，从二元论的角度来说呢，它们是可以分开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纯感性的，也没有纯理性的。没有纯感性的东西，也没有纯理性的东西，大家都在交往，只不过是干什么呢，搞理论的人呢，他习惯于把生活中的现象进行理论的提升。其实提升的时候，也没有离开感性。你比如说，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些书，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你要是没有对于大众文化的切身感受，你是没法谈的。刚才我说的大众文化的那种巨大的渗透性，那我自己身在其中啊，你就感同啊。特别是在今天，你说，你生活中，别人家的孩子要出国有钱，没钱。别人的媳妇开个名车，我媳妇开了名车。这种压抑，你摆脱不了。他就像评教授一样，你的同学评上了，你没评上。这个痛苦摆脱不了，但是你在痛苦和压抑中要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提升上来，你就理论了，你就理性了。所以应该这么认为，当你理性，理论和理性，理性和感性它们是一体化关系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要想开发自己的感性，只要在自已有理性上向感性投入，你就可以更多得占有感性。任何一个人，你在感性中没有理性，那么你来谈谈博士，你就很快乐理性了。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你就由此断绝了感性，或者由此隔绝了理性，它们应该是一体化的，而真正的比较让人感觉到愉快的，你们自己感觉到愉快的就是，理性和感性应该是和谐的，不应该是单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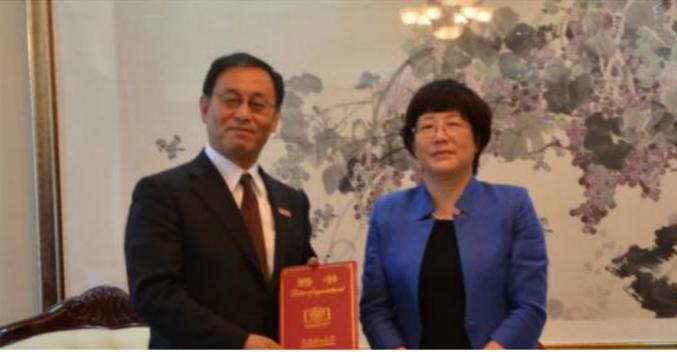
主持人：谢谢高老师！能看出大家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今天的提问只能到此为止。我隆重地向大家推荐一下，高老师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本理论论著作，它的名字叫《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在网上是可以购到的。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文本的阅读，继续和高老师在精神上获得一种交流。感谢高楠教授百忙中光临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沙龙。同时感谢研究生部的书记韩殿秀书记，并感谢我们文学研究部的郑院长，以及周敏教授的光临。感谢说有在座每一位同学、老师的光临。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对我们博士沙龙的支持，期待相聚下一次博士沙龙，今天到此为止！

女一：高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目前西方文论的书，都是写些什么书。它本身会有一些缺陷，比如说材料的堆砌啊，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啊比较少，您能不能帮我们推荐，您个人认为做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书，供我们来阅读？

高楠：就是西方的书，转换的比较好的。女一：就是借着西方的理论，比较经典的一些书。高楠：就是转换得比较好的。转换得比

· 沙龙拾粹 ·

以感恩之心 做学问之事——专访早稻田大学森山卓郎教授



编者按：此次《言思录》海外专题访谈，采访了早稻田大学森山卓郎教授。采访主要涉及了老师的研究动机、研究内容、治学态度等。森山老师回忆了他的学生时代，并指出了中日研究生教育上的不同，等等。从老师一连串精彩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一位谦恭、和蔼、严谨而又热情的学者形象。

采访对象：森山卓郎 (Moriyama takuro) 教授（1960－），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早稻田大学文学学術院教授。曾先后在大阪大学文学部、京都教育大学教育学部等大学任职。曾担任国语学会（日语学会）、日语教育学会、日语语法学会、日语语用学学会编委、评委。著作有『日本語動詞述語文の研究』、『ここからは日本語文法』、『日本語の文法3 モダリティ』『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日本語』【標準日本語】等。

采访内容：周：先生的研究分野や研究内容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老师，请介绍下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森山：現代日本語を中心とした文法論です。そこららの研究上の拡張や応用についても考えています。我主要是搞现代日语语法研究，还涉及到日语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方面。

周：院生時代は学術生涯の始まりとも言われますが、先生の学生時代、特に院生時代についてお聞き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文法研究に興味を持って、将来これを従事しようと思を立てるのはいつからでしょうか？どんな努力をなさいましたか。何か特別な体験や思いがあるでしょうか。常说学术生涯始于研究生时代，想请老师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语法研究感兴趣，并且立志从事语法研究的呢，都做了哪些努力？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和感受吗？森山：研究を目指したのは学部 の2年生の秋です。仁田義雄先生との出会いが大きかったです。特別な体験はありませんが、大学院時代、夜間中学校の先生もしていました。教育を受ける機会がなかった高齢の方が一生懸命勉強する姿に接し、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ました。研究の根本として、「為人民服務」という意識を持つことはとても大切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我是从本科2 年级开始对语法研究感兴趣的。仁田义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曾在中学夜校当过老师，不过这也谈不上是什么特别的体验。我看到一些过去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年长者都在拼命努力，感触颇深。我觉得，研究的根本应该是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

周：先生は度々中国へいらっしやって、講演や集中講義などをなさるそうです。また、毎年先生のごころへ勉強に来る中国人留学生もたくさんいますね。先生にとって、中日両国において、院生教育の仕方はどう違うのでしょうか。また、中国の院生教育に何か希望やアドバイスのことがありますか。老师经常来中国演讲或做集中讲义，每年来这儿你们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多。在您看来，中日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何不同？您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有什么希望或者建议吗？森山：中国の大学院生のみなさんの水準はこれまでも非常に高かったですが、最近さらに高くな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周：先生は度々中国へいらっしやって、講演や集中講義などをなさるそうです。また、毎年先生のごころへ勉強に来る中国人留学生もたくさんいますね。先生にとって、中日両国において、院生教育の仕方はどう違うのでしょうか。また、中国の院生教育に何か希望やアドバイスのことがありますか。老师经常来中国演讲或做集中讲义，每年来这儿你们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多。在您看来，中日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何不同？您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有什么希望或者建议吗？森山：中国の大学院生のみなさんの水準はこれまでも非常に高かったですが、最近さらに高くな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特邀编采：周萌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对“大文学”的探寻——专访俄语系青年教师齐昕老师

按语：此次访谈博士沙龙《言思路》通过邮件采访了还身在俄罗斯进修的俄语系青年教师齐昕老师。在这次难得的采访中，齐昕老师谈到了他最喜爱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回忆了他走向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契机，简述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认识和研究体会，并给予研究生同学以深切寄语。在这些真切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谦逊、富有学术热情的青年学者的影子，更能体会到吸引着他的深沉厚重的俄罗斯文学，而这种“大文学”的背后，则是更为丰富、深远、广阔的俄罗斯文化世界。

采访对象：齐昕，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讲师，博士。1999年 - 2003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俄语系，获俄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3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赴俄罗斯留学，就读于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语文系，2005 年获俄语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俄语言文学博士学位，201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主要从事俄罗斯当代小说和俄罗斯宗教思想史的研究。

采访问题：（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Q:索契冬奥会的开幕、闭幕仪式上俄罗斯文学元素大放异彩。据说，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均藏书量最多的国家，俄罗斯也获得了世界上“最爱阅读的国家”的美誉。您觉得，为什么俄罗斯人如此崇尚文学？俄罗斯文学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A:有关“最爱阅读的国家”的印象，其实与前苏联官方的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有很大关系。这其中比较复杂的时代和政治因素，具体就不展开了。如今的俄罗斯，阅读不再是多么受推崇的事，严肃文学的市场不断缩小、边缘化。个人觉得，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在经历严重危机。不过，作为俄罗斯文化最有力的代表，俄语文学在这个国家文化领域的地位还是很突出的。在俄罗斯，真正的好作家、大作家一般都拥有社会批评家、文化代言人、政论家、思想领袖等多重身份，活跃在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到俄罗斯文学的特别之处，我个人将它最经典的传统归结为四个字——“悲天悯人”，这一气质是俄罗斯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多演变融合的结果。简单地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考据”东西，经常会发现，许多原本奇妙的细节变得平淡无奇，而真正的“妙处”Q:您现在从事的主要是俄罗斯当代小说和俄罗斯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和该领域在当下的研究情况吗？A:俄罗斯目前所经历的是一个空前的意识形态自由期。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惯性交织在一起，各类思想和社会、宗教思潮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我比较关注俄语文学对此的描述。这其中当然也牵涉到了俄罗斯宗教思想和教会发展史的很多问题。老实说，我的研究并不深入。目前我所做的是尽量仔细观察、认真倾听，不做过多的评价，不随便下结论。

Q: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多年，您觉得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之间是什么关系？A:纯粹的文学研究无疑是个苦差事。将一部经典或者不那么经典的作品拆开开来，窥探其中，“考据”东西，个人化的、纯粹风花雪月的、文字游戏类的种种都不是



它所特别关心的。它是一个硬质的、大气的，较为沉郁的文化体。

Q:能否和我们说说，您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是哪位，最喜爱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又是哪部？为什么？

A: 作为一位俄语文学的从业人员，不爱普希金是不可能的。他实在太全能了。普希金远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抒情诗人，他更是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因专业研究的关系，最近重读他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直译为“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每每为其中机智与锋芒拍案叫绝。

除此之外，我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十九世纪作家列斯科夫（Н. В. Лесков）[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сков, 1831-1895）, 俄国记者、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年）、《图拉의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1881年）以及《神职人员》（1872年）。]，尤其是他那部《Несмертельный голован》【直译为：“不死的大头”。】。列斯科夫将俄罗斯语言世俗狡黠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且成功地用它书写了俄罗斯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中非常典型的人物与品格。他作品中的机智、客观、从容是经典俄语文学所比较缺乏的，他对文字的讲究与锤炼也非常罕见。

Q:您现在从事的主要是俄罗斯当代小说和俄罗斯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和该领域在当下的研究情况吗？

A:俄罗斯目前所经历的是一个空前的意识形态自由期。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惯性交织在一起，各类思想和社会、宗教思潮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我比较关注俄语文学对此的描述。这其中当然也牵涉到了俄罗斯宗教思想和教会发展史的很多问题。老实说，我的研究并不深入。目前我所做的是尽量仔细观察、认真倾听，不做过多的评价，不随便下结论。

Q: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多年，您觉得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之间是什么关系？

A:纯粹的文学研究无疑是个苦差事。将一部经典或者不那么经典的作品拆开开来，窥探其中，“考据”东西，个人化的、纯粹风花雪月的、文字游戏类的种种都不是

有情感依归的文学和学术——与英语学院顾悦老师面对面

（关于学生生涯）Q：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您可以说是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世界里。请问，是什么吸引着您学习俄语、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并最终选择了学术这条道路？（您在何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志向？回顾自己的研究道路，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和感受吗？）

A:我个人其实很少回顾自己的专业选择和求学历程。我是个随性的人，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的经历应该没什么典型性。我的最终选择其实完成于十三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念完大二，成绩还不错。但是对专业谈不上有多大热情，比较彷徨。于是，我做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选择——大三去俄罗斯进修一年。有人可能会问，你不是对本专业不冷不热吗，怎么还要去留学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明了：我要亲身去看一下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来彻底决定要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之联系起来。大三一年在俄罗斯插班进修的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在我的专业履历上留下了决定性的红印——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当初决定研究当代俄语小说，多少受了已故的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的影响。记得本科期间听余教授的讲座，他反复强调，俄语文学并没有在新时期沉寂下来，好作家、好作品比比皆是。余老师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当代作家瓦尔拉莫夫 (A. Н. Варламов)[瓦尔拉莫夫 1963 年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莫斯科大学。作品有中篇小说《生》、《乡间的房子》、短篇小说《傻瓜》、《沉没的方舟》、《教堂的圆顶》等，此外还著有《普里什文传》。1995 年作家因《生》获得俄《独立报》所设的反布克奖，其后因“在文学作品中细致探究当代世界中人性的力量和脆弱之处”荣膺 2006 年度索尔仁尼琴文学奖。]的小说集，于是我就从瓦尔拉莫夫“个案”研究出发，一头“栽进”当代俄语小说的世界。

俄罗斯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俄语文化有和独特气质？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我的回答很抽象无奈：这个国家很特殊，这里的文化很特别。对于研究者来说，对它的领悟和接受是个无比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很自然，我还在行进过程中，我没有过多的答案。俄语文学是我探究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特殊”之处的一个基本切入点。于此同时，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俄语里所说的那种“кабинетный ученый”【直译为“办公室学者”，大意指脱离生活、刻板拘束的研究者】。从文学出发，我对俄罗斯国家及文化的兴趣包罗万象。然而，也正是因为俄罗斯文学的博大与深广，才往往在研究的关键时刻给了我踏实的基点，不至于发散到不可收拾。

Q:作为高校人文专业文学领域的一名青年教师，请问您对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有什么建议？A: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同学，我有几条基本的建议：不要过早限制住自己的学术兴趣，不要将研究范围定的过于狭窄。我一直认为，力所能及的“杂食”对于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还要，要对自己研究的内容有实在的把握，不要自欺欺人，不要以炮制各类文章、乱吹“学术泡泡”为目的。目前国内学术研究的氛围不大好，所以自律尤为重要。最后，不要盲从权威，给自己胡乱树立所谓“学术偶像”。

（寄语）Q:最后能否给《言思录》或博士沙龙写几句寄语？A:把多年之前读到的且一直都非常喜欢的龙应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自己的时代，自己明白。图腾、谎言、真相，如何识破，如何理清，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结语：齐昕老师最后的寄语意味深长，让人沉思。身为一个学科研究者，要看得真切、明了、深入，独辟蹊径而不林林独；作为一个人，更要学会如何思考，从而解析现实，也认识自己。有人说文学是现实的一枚硬币，我们能通过阅读反观世界、 反观历史，文学也使我们的眼界变得更加深远，她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自身时空之外的世界，又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在日常沉浮之时未曾注意的东西；其实，文学有时也是人心的镜子，当我们唏嘘感叹文学中人物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也被映照出来了吗？严肃文学也许流行不再，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不可或缺，对它的阅读与研究始终会继续下去。

（寄语）Q:最后能否给《言思录》或博士沙龙写几句寄语？A:把多年之前读到的且一直都非常喜欢的龙应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自己的时代，自己明白。图腾、谎言、真相，如何识破，如何理清，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结语：齐昕老师最后的寄语意味深长，让人沉思。身为一个学科研究者，要看得真切、明了、深入，独辟蹊径而不林林独；作为一个人，更要学会如何思考，从而解析现实，也认识自己。有人说文学是现实的一枚硬币，我们能通过阅读反观世界、 反观历史，文学也使我们的眼界变得更加深远，她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自身时空之外的世界，又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在日常沉浮之时未曾注意的东西；其实，文学有时也是人心的镜子，当我们唏嘘感叹文学中人物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也被映照出来了吗？严肃文学也许流行不再，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不可或缺，对它的阅读与研究始终会继续下去。

A：首先我觉得，也许我们不必匆忙地将文学与学术去挂钩。我也在以前写的文章中提到过，假如一个人对文学并不怀有热爱，而他又要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学习、研究、工作，这就回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文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应该感到文学是非常吸引他的，如果他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而又刚好巧在学文学专业，那我觉得这就比较遗憾了，可能一开始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不该选择这条道路。

其次，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觉得学文学的人会发现文学是一种很好的陪伴。哈罗德·布鲁姆（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文学理论家——编者注）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这世界上你能找到的真正与你相契的朋友其实很少，这些朋友中能够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就更少了，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此。你可

编采：蔡玲丽 周阳雨

有情感依归的文学和学术——与英语学院顾悦老师面对面

从文学中找到未必能轻易从身边找到的陪伴。再有就是，文学可以让你看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你会感受到好多好多很美的东西。比如说，最近你会发现上外的草地上开了很多非常小的蓝色野花，也许不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它们，但假如你长期热爱文学，你会对美非常敏感，你就会注意到这些微小的事物，你会被它打动，会觉得，你的脚踩在草地上，和踩在土地上、踩在大路上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类似这样的体验，我觉得都是多年的文学阅读带给你的感受世界的另一种维度。文学让人的内心情感更加细腻，对美的捕捉更加敏锐，通俗来说就是，热爱文学的人会更有人气质。

Q: 我们知道老师读过许多文学作品，那么其中您最喜欢的作品和流派是？或者可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阅读经历？

A: 曾有人说，一个人 13 岁时读的书就是他一辈子都喜欢且反复读的书。我 13 岁时正好就在读英美小说，之后我从事的也确实英美小说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我接触过一些俄、法作家的作品，之后再接触英美作家作品，就觉得后者真是太简洁、情性性太强，相对而言太有可读性了，于是就更加受到英美作品的吸引。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书有两本。一本是《汤姆·索亚历险记》，最初我是听儿童节目的时候听到人家在念这本小说，一下子就特别受它吸引，觉得这样的世界真是可爱。另一本是《大卫·科波菲尔》。其实我小学阶段读的书里，中国小说比较多，比如《三国》、《水浒》。但我在读了《大卫·科波菲尔》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我第一印象到，一部作品能够真正触动你的灵魂——《三国》、《水浒》能够引起我的好奇，能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但确实与触动灵魂没有太大关系。我只是简单地一说，因为若要特别指出喜欢的具体流派，我似乎也不大得出，但我少年时期读的那些狄更斯的小说，确实是深深打动我的。后来我比较喜欢的作家还有哈代。我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具体到哪个特定的流派或者作家，但假如说到最深刻的喜爱，我觉得还是早期的阅读经验对人的影响比较大。

Q: 记得老师曾经在您的一篇论文中谈及“文学的情感回归”问题，您觉得我们硕士生可以从怎样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呢？A: 实际上我认为，首先，如果一位研究生在毕业后不从事学术工作，那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学术圈的那套话语体系，但可以把专业学习当做是提高自身修养和语言能力的一个好机会。当然，不论是否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研究生都是要写论文的，那么我的建议：第一是永远不要放弃你的阅读体验，这才是根本；第二是，要读就读经典——这一点上包括写论文也是一样，大家写论文时其实不该局限于参考中国知网上的文章，可以多看原文数据库，因为中国学术界目前就规范性 and 水准而言都还应当向更高标准看齐。再有一点，大家也不应该觉得自己是“搞文学”的，而不妨趁这几年多读些好书，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这其实对于个人更有好处，并且读作品原文肯定是提高自己语言水平的最好方式。

Q: 倒数第二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对于“学术尊严”的理解？A: 我把“学术尊严”理解成学术规范、追求来说一下吧。首先，我觉得养成良好的引用习惯是很重要的，如果看到别人说的话很好，想要用，那就必须注一下。这只要养成了习惯就好。说到尊严，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保持思想独立性，这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其实中国还是比较缺乏这种精神，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你永远应该爱真理多过爱你的老师或领导——套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要做到这个确实有其难度。这里我还是提点建议吧，建议那些还不确定要不要走学术道路的同学：如果你对投身学术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喜爱，只是想要找到一种过生活的方式，那我可能劝这样的同学不要考虑这个路线——效率不高，意义不大。我在加州伯克利学习过一年，在学术上比较深的一点感触就是：大体上，那里的学者比我们的学者更加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确是出于喜爱而选择了这条道路，毕竟走这条道路未必会得到多少名利。但是我们这儿有时候很无奈。而事实是，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

Q: 最后，想请您送给《言思录》的读者几句寄语？非常感谢顾老师！A：我有一个小建议：希望大家平时不要光顾着读教材，而能多花时间读一些真正好的作品。人这一生，时间很宝贵，该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概括地说，我最希望大家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生阶段，能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幸福。

Q: 倒数第二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对于“学术尊严”的理解？A: 我把“学术尊严”理解成学术规范、追求来说一下吧。首先，我觉得养成良好的引用习惯是很重要的，如果看到别人说的话很好，想要用，那就必须注一下。这只要养成了习惯就好。说到尊严，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保持思想独立性，这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其实中国还是比较缺乏这种精神，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你永远应该爱真理多过爱你的老师或领导——套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要做到这个确实有其难度。这里我还是提点建议吧，建议那些还不确定要不要走学术道路的同学：如果你对投身学术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喜爱，只是想要找到一种过生活的方式，那我可能劝这样的同学不要考虑这个路线——效率不高，意义不大。我在加州伯克利学习过一年，在学术上比较深的一点感触就是：大体上，那里的学者比我们的学者更加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确是出于喜爱而选择了这条道路，毕竟走这条道路未必会得到多少名利。但是我们这儿有时候很无奈。而事实是，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

Q: 最后，想请您送给《言思录》的读者几句寄语？非常感谢顾老师！A：我有一个小建议：希望大家平时不要光顾着读教材，而能多花时间读一些真正好的作品。人这一生，时间很宝贵，该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概括地说，我最希望大家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生阶段，能让自己的生更加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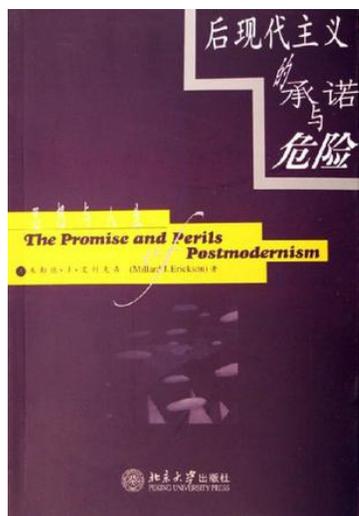
Q: 谈到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我们也许会发现在部分学者似乎颇有一种“堆砌术语”的倾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A: 确实有一部分人存在这样的倾向。我想可以这么说：不爱文学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写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那和激情、才华热爱很有关系；反之，便自然而然有可能作出怎样的研究。

Q: 在文学专业的文本阅读、论文写作过程中，可能好些同学都会困惑于一个问题，就是在阅读文本时如何平衡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这也是“感”和“知”的两方面？老师可以从个人经验角度对此给出一点建议吗？A: 我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文本的阅读方式，一个是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把握。

首先就个人而言，我写论文只是为了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我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无聊可厌，那些书籍也都是我本就想读的。如果只把写文章当成做作业，人就自然容易觉得无趣。其次我认为，对文本的感性体验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体的阅读体验非常重要，而个体阅读体验未必非得加入解读。比如，我们看《来自星星的你》，看了就看了，未

编采：徐宜修 周阳雨

沙龙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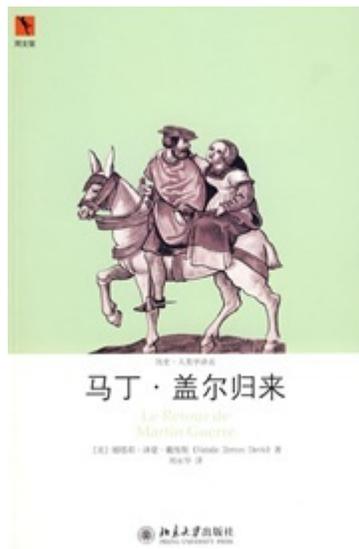
评《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

该书可以说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次细致解剖。它完全有成为一本不错的后现代主义教科书的潜质,完败任何一本传统思维的课本。它不会从一开始就抛给你一大堆概念,而是对主要的理论代表的思想进行细致解读和分析,进而整理概括,从具体到抽象;它也不会为了追求开门见山而显得唐突,而是告之你一个思潮形成的前世今生,从而使你明白它何以形成今日的面貌,又利弊集合,而后又将如何发展。应该说本书的写作非常符合我们平常认知新事物的习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

第一部分作者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其中包括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主要内容及最初部分后现代思想的前兆。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主要几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梳理,总结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第三部分,作者真正切题,阐发了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主义方面的贡献,同时揭示了它本身存在的思想矛盾和危害。可见,这是一本结构层次分明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在每章写作中总是能够抽丝剥茧地整理出每个哲学理论家的主要思想,并通过生动语言对其进行说明,而章节末尾的分析小结能帮助我们前文信息进行抽象化。如果你想知道后现代主义有着怎样的基因,它如何进化而来又该去向何处,那么就请来读一读这本书吧。

——上外博士沙龙第 107 期嘉宾乔国强教授推荐



《马丁·盖尔归来》

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这本《马丁·盖尔归来》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共誉为后现代史学典范。该书讲述了一桩十六世纪发生在法国南方朗格多克的奇闻怪事:富农马丁盖

尔因偷了父亲一口袋子,突然离家出走,一去多年,杳无音讯。就在此事渐渐平复之时,八年他还家了——或者说村里的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美好的新生活维持了不久,马丁的叔父皮埃尔却将其告上了法庭,声称他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案子几经周折,最终由图卢兹法院的大法官让·德科拉斯(Jean de Coras)主审。新马丁应对沉着,言辞恳切,将对他的控诉一一驳斥。然就在法庭因证据不足即将开释被告之时,一个装有木腿的瘸子闯入法庭,声称自己才是马丁·盖尔。而假的马丁——阿诺·迪蒂尔最终被处以绞刑。戴维斯第一次读到德科拉斯《难忘的判决》时就觉得此事戏剧性极强,真假混淆,善恶难辨,“应该拍成一部片子”。在她为同名电影担任顾问后,她对影片脱离历史记载颇为惋惜,并有了重新叙述、进行史学分析的欲望。她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中收益颇多,试图重新运用叙述传统来应对“虚构”的问题——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困惑,也曾经是马丁·盖尔的妻子贝特朗曾经面对的问题。

——上外博士沙龙第 118 期嘉宾陈新教授推荐



《异的考验》

安托瓦纳·贝尔曼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哲学家、德语文学和拉美文学翻译家。他于八十年代出版了三本颇受瞩目的翻译理论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本书《异的考验》(l'épreuve de l'étranger)。该书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入手,针对“翻译”这个常被忽视或误解的活动展开反思。过去一方面虽然有种种针对翻译原则、技巧、方法的讨论,但是其经常视翻译为无需理论指导的直觉性活动,只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便戛然而止;另一方面对于翻译理论的阐发并不都出自于翻译实践者,甚至多来自于哲学家、语言学者,这种现象使得翻译始终处在暧昧不明、尴尬的理论境地。贝尔曼在爬梳翻译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德国浪漫派对待翻译既立论,又实践,翻译活动对于德国文化的影响作用远超过法国等国家。从路德版《圣经》对德语的改造和贡献,到歌德的世界文学和翻译的关系,至“雅典娜神殿”派的“无线相融”和追求“广义翻译”,再到荷尔德林推崇的诗化翻译,贝尔曼将自路德以来重要的文学和翻译的发展——梳理评析,纵向来看虽则采用的是历时研究的方法,但全书却未曾远离翻译的文化本质,并且指出翻译的目的是要揭示自身和异己的关系,翻译并非低人一等的“异”,而是可以充盈发展自身的“异”。自身和异己并非对立排斥,前者占有后者,而是两相包容,尊重他者以发展自我。书中提到的翻译伦理也在贝尔曼随后的两本专著中不断发展,也成为众多学者借鉴研究的对象,并预示着之后翻译领域内“文化”和“伦理”转向的到来。

——外博士沙龙第 122 期嘉宾袁筱一教授推荐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
最新学术成果目录选摘

高楠

高楠·20 世纪前 20 年的中国现代性文论建构

[J]. 海南大学学报, 2013, 31(4): 49-56

高楠·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 理性批判与文论的新理性精神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3): 4-14

高楠·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涅槃——由政治一体化到跨越式阐释

[J]. 文艺争鸣, 2013(11): 11-19

门洪华

门洪华, 甄文东·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

[J]. 外交评论, 2013(3):93-108.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9):54-66.

门洪华·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

[J]. 国际观察, 2014(1):11-24.

门洪华 刘笑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历史进程、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6):63-74.

乔国强

乔国强·论波焦利的先锋理论

[J]. 复旦学报, 2013(2):67-78.

乔国强·美国犹太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

[J]. 外国文学, 2013(4):46-52.

乔国强·试谈美国早期文学及其书写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1):49-54.

乔国强·索尔·贝娄学术史研究

[J]. 东吴文学, 2013(2):138-143.